



一张工票

作家出版社出版

资产阶

1955

水

作家出版社

一张工票

书号 1833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8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2}$ 插页 2

1965年4月北京第1版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册 定价(2) 0.34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目 录

- 矿工今昔 楊家桥煤矿党委办公室 (1)
- 一张工票 龔 仁整理 (12)
- 换了人間 中共青島市盐务局党委宣传部 (17)
- 血泪装满“利源”船 厚 原 松 濤 (25)
- 在徒工的白骨上 王信敏整理 (29)
- 紡織工人的血泪
..... 中共杭州第一棉紡織印染厂委员会 (37)
- 絲織世家 蔣林生 (47)
- 我的三十年 郭可銀 (55)
- 陶瓷工人的仇恨 河南禹县神屋瓷厂编写 (63)
- 童工血泪 施燦荣 (69)
- 难忘的仇恨 陈福生口述 龔道鈞整理 (81)
- 第一次拿工錢 戴开忠 (95)
- “陈李济”的发家 譚伙根 (99)
- 揭开“老正和”这块金字招牌 徐雪林 (103)
- 从苦海中解放出来
..... 中共山东济宁市委宣传部记录整理 (112)
- 資本家的“科学管理” 徐曾奇 (119)
- 李学庆学徒的时候 刘北汜 (125)

矿工今昔

湘潭市楊家桥煤矿，是一个飽經滄桑的老煤矿。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周围的地主就雇用工人，零零星星开辟了“乡井”采煤。一九三七年以后，地主黃竹筠、資本家陆苞吾等，見采煤有利可图，便集資合办，成立了“湘江煤矿公司”，雇用大批工人，进行开采。一九四三年，伪資源委员会又插手进来，变为官商合办，改名为“湘江矿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雇用两千多工人，进行敲骨吸髓的血腥勾当。据初步統計，仅伪湘江煤矿开办十多年，官僚資本家就从工人身上榨取純利上千万銀元。

一九四九年八月湘潭市解放，楊家桥煤矿才获得了新生。十几年来，它的面貌日新月异，变化惊人。过去又矮又陡的矿井不見了，新建的矿井，牢固高大，高高的井架，聳立半空；电动絞車把一桶桶的原煤，从井下輕輕地提到地面，經過一条条軌道，运到各个煤仓。絞車、风机的轰鳴，夹杂着矿車运行的隆隆声，代替了过去把头的叫罵和矿工痛苦的呻吟。

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旧社会的“煤黑子”，成了矿山的主人，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领导干部和

工程师。生活，是大大的变样了，过去，矿工“病了踢出矿，死了丢进坑”。现在矿里实行了劳保，矿工的病、老、伤、残，生、养、死、葬，都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和安置。以前矿长住的漂亮别墅，现在改成了职工宿舍。过去专供资本家玩乐的羽毛球场，四周围上铁丝网，不准工人进去，现在已经经过改建，矿工们下班以后，经常在这里打球。新建的俱乐部，代替了过去把头骗钱、矿工遭殃的赌场。里面有图书室、游艺室，矿工们经常来这里看书、看戏、看电影。过去的荒山坡上，兴建了职工业余学校和子弟学校，过去被剥夺了学习权利的矿工，如今都能得到学习的机会，起码都有了初小文化程度，有些工人还达到中学以上的水平。

解放前，矿工们都是过的“几代同堂共一床，崽女乞讨饿断肠”的苦难生活，现在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职工宿舍，家具、衣服，样样齐全。从十三岁就在矿里做工的周立秋，以前拼死拼命劳动，挨打受骂还不算，连三口之家也养不活，堂客只得靠讨饭为生。住的是间茅棚，一刮风就“打摆子”，左右摇摆，外面落雨，屋里落“血”（茅草屋漏下的水是酱色，象血一样），进屋要低头，出来一阵还直不起腰。四个人共床烂被子，冷起来只好盖稻草。三块砖架口小烂锅，经常没东西煮。如今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屋，不少吃不少穿，用具不缺，四季衣服齐全，还有余钱存在银行里。他常说：“我现在一年的工资，比我过去在湘江煤矿十二年的钱还多，生活过得真是豆腐里头挑不出骨

头,再沒有讲的了。”

旧社会的“煤黑子”,是今天矿山的主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解放以来,在生产上搞了许多革新,創造了不少奇迹。如今,楊家桥煤矿,結束了湘江老井开采,正在附近的新井田积极采煤,准备兴建新井。职工們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忘我地劳动,为兴建自己的新矿山高歌前进。

要知过去苦,方觉今日甜,要真正認識楊家桥煤矿发生的这种变化,要真正了解楊家桥煤矿工人对新生活的贊美,靠上面的对比,还不能一下說清。那么,我們就从老工人們的口中,了解一下解放前的楊家桥煤矿,了解一下当时工人們过的那种牛馬不如的悲惨生活吧。

解放前,老板只图賺錢,百般殘害工人。过去楊家桥煤矿根本沒有一点安全設施,矿工下井是光身赤脚,仅头上围一条自备的土布巾,算是“安全帽”。那时被瓦斯爆炸、“冒頂”、“穿水”等事故打死、淹死,被岩石打断脚、摔断手而成殘废的矿工,不知道有多少。現在工人們一提起这些事来,还要流泪,他們对旧社会、对剝削阶级,怀着无比的仇恨。

有一年,地主周老三在白鹿冲坳上,开了一个“乡井”,独眼采煤达二百米深,只用木风箱通风,用竹筒做“孔明車”抽水,結果因通风不良,发生瓦斯爆炸。周老三綁着井下工人的死活,他为了保存矿井,馬上命令狗腿子

封閉井口。狗腿子們剛用土封了一半，有個工人掙扎着爬到了井口。周老三怕這個工人得救，把事情聲張出去，便命令狗腿子將這個工人推下井去。這個工人死死地抓住地腳不放手，慘無人性的周老三，竟拿起斧頭把他的雙手砍斷。隨着一聲慘叫，這個工人又跌下井去。狗腿子們立即把井封掉填平。當時在井下工作的八個工人，就這樣葬身井底。

一九四七年，三號井二號墻頭“冒頂”，垮下大量的土和石頭，把工人周順洪埋在底下。礦工們聽到響聲，紛紛趕到墻頭，奮勇搶救，把周順洪的上半身翻了出來。但是，他的兩隻腳被兩塊大石頭卡住，石頭搬不動，腳又扯不出。周順洪痛得昏過去幾次，大家十分着急。這時，總監工走來了，他邊走邊罵：“他媽的，你們圍在這裡做什麼，不想活了！”他手持皮鞭，走攏來見人就打，邊打邊吼：“都去做工，莫翻了，莫耽誤老子的工，拿把斧頭來，把他的腳砍掉就是，老子要的是煤不是人！”周順洪一聽總監工要把他的腳砍掉，苦苦哀求：“總監工，求求你，砍不得呀，我才二十歲，沒有腳，怎麼活……”“遲死不如早死！”總監工舉起斧頭就要砍。礦工們再也無法忍受了，憤怒地奪下了斧頭，轰跑了總監工，把周順洪救了出來。大家剛把他抬到井口，總監工又跑來了，指着周順洪吼道：“你被開除了，馬上滾！”總監工把周順洪開除後還不甘心，連搶救周順洪的工人們的工資都剋扣不發了。

過去，井下挖出來的煤，沒有機械提升設備，完全靠

小工用一根弯扁担和一副圆口筲箕挑出井口。井峒又矮又窄，坡度又大，他们只能爬进爬出，有时挑，有时拖。井峒里连一根扶手的索竹都没有，进出非常危险。一九四五年，四号井有个小工，挑着一担煤，快走出井口，不幸失足一滑，跌下井去，摔得粉身碎骨。一九四六年，把头叫两个新来的工人，下井单独操作。那天，井下发生“穿水”事故，他们因巷道不熟，跑不出来，都被淹死了。把头不闻不问，只在水牌上把他们的名字一抹了事。

以上不过是老板只图赚钱而残害工人的几个例子，象这样惨死的工人，解放前不计其数。所以老工人说那时的矿山，真是“鬼门关”。

伪矿长刘伯庵为了统治压榨工人，保护矿里的“安全”，一个两千来人的矿山，就派了几十个国民党党棍、特务、帮会头子、流氓，充当监工和把头，监视工人的生产和行动。一个二百多人的矿警队，专门负责镇压工人的反抗。这些家伙，狐假虎威、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们随身带着皮鞭、竹板，任意打杀工人，奸污和霸占工人的妻女。不少工人被他们活活地害死，打成残疾；不少工人被他们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一九四八年五月，矿工李德云路过矿长刘伯庵的亲信、工头“萧裤子”门口，“萧裤子”纵狗咬人，李德云出于自卫，拾块石头打去，恰巧打中狗头，将狗打死。于是“萧裤子”便拖把大刀，气势汹汹地追赶出来，吓得李德云逃

到废井峒里，連家都不敢回。可是不做工，全家都会餓死，他在峒里餓了两天，实在沒法，只好悄悄跑出来，把家里的几件衣服卖掉，以五块光洋为礼，求帮会大爷“曠滿肉”同他到“蕭袴子”家去說情。那知两人刚到流水槽坳嘴上，突然窜出几个打手，抓住李德云就打。“我是賠……”李德云的“礼”字还未說出口，就被一頓乱棍活活地打死了！

老工人周立秋有次在三号井做工，突然，頂棚掉下一块石头，把蒸汽管子打坏了。蒸汽往外噴，悶得人喘不过气来，工人们只好躲在彎道里。不料监工走来，硬說是周立秋打破的，不問情由，就是一頓毒打。又一次，周立秋在挖煤时，将井下通行证（銅牌子）丢了，监工見他无牌子，不由分說，拿起“劈块子”（頂棚用材）又把他打了一頓。周立秋想：这样打下去，不知哪天会被打死。于是情愿挨餓，用两个月工資，买了一頂銅質矿帽。可是不久，銅质帽也被打得一凸一凹。有次他在井下車水，因通风不良，溫度又高，他站在那里，累得喘不过气来。管班“廖三快活”走来罵他不卖力，拿起竹板劈头就打，打得矿帽“咯咯”响。“廖三快活”一看是个銅質帽，更是兽性大发：“你的脑壳是铁打的，怪不得咯咯响，再試試硬吧！”随即双手抓起一根竹子，对准周立秋头上就是几下，把矿帽打凹几个地方，打得周立秋头晕眼花。但“廖三快活”还不罢休，把竹子一丢，又吼道：“不錯，还够硬。狗崽子，想得倒好，曉得带上矿帽，脸上怎么不带上面罩呢？”吼罢，对准周立秋的嘴巴又是一拳，打得他鮮血直噴。如今，这頂矿帽陈列在楊

家桥煤矿矿史展覽館里，成了矿工挨打受罵的历史見證。

騎在矿工头上作威作福的資本家、监工和把头，还是一群蹂躪妇女的魔王，任意霸占和污辱矿工的妻女。伪矿警队李副班长，見有个姓刘的工人的妻子长得漂亮，一天趁刘上班去了，就闖进刘家，强奸了刘妻。但他并不以此滿足，还想强占为妻。有次，他探听得刘去石潭有事，便持枪埋伏在草丛里，开枪把刘打死。回到矿里，他假造一张借据，說刘前年結婚，借了他二十块钱，利上加利，已滾到八十块。接着又用十块光洋，收买一个把头，作为证人。刘妻申告无門，就这样，被他强行霸占了。

矿工們成年累月，不分昼夜，象牛馬般的辛勤劳动，但生活却比牛馬还不如。吃的是“喂猪不胖，瀝氈不肥”的霉米飯和腌菜湯。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很多工人冬天沒有穿过棉衣，一到夏天，就是一条长手巾过日子；下井纏头，出井扎腰。住的茅草棚，“屋頂是‘天窗’，落雨洗淋浴，晴天晒太阳，雨天房成氈，冬天雪滿床。”他們的生活如此苦，劳动定額却很高，一天劳动十多小时，所得微薄工資，还要遭受資本家、监工、把头等的层层剝削。其剝削方式，真是花样百出，名目繁多：

扣压工資，获取暴利：工人每月的工資，要过“三关”：矿里資本家拖欠十天半月，甚至一月两月，这是第一关；會計到湘潭去領錢，在湘潭做几天生意之后才拿回来，这是第二关；发到工头手里，貪污中飽，这是第三关。“三

关”一过，等工人領到手里，鈔票贬值，工人又要倒霉。一九四七年八、九两月的工資，被这些吸血鬼們换来換去，拖到十月下旬才发。工人們拿到这两个月的工資，最多只能买到三斤白菜。

任意尅扣，磨賬賴賬：那时，把头可以随意借口估工过高，賠了本，以尅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全部賴掉。一九四八年，三棚的把头賴說估工过高賠了本，不但把四十多个工人三个月的工資尅扣不发，連吃米也都不給。另外，矿里还規定，沒做滿一个月不給工資，有病沒出工不发工資。工人周伏云得了矽肺病，不能支持下井。他刚停工三天，工头就恶狠狠地对他說：“矿里不要病人，馬上卷起你的狗窩走！”并且連当月已做的工的工資都不发給。周伏云穿着仅有的一件烂衣，一步一移，刚走了半里路，就死在路旁。

逢年过节，敲榨勒索：每年春节、端午、中秋，工人都非送礼給监工、把头不可，每次至少要花去一个月工錢。如果有誰沒送礼，不是挨打，就是被开除。一个姓陈的工人，有次过年沒錢送礼，大年初二，监工就不准他上班。他只好将仅有的一床被子卖掉，送了礼才算了事，害得他睡了一冬天的澡堂和鍋炉房。一九四三年冬天，工人老吳一家五口人病了四口。春节前夕，他領到五块錢的工資，看病买药，用去四块，买米用去一块，沒錢送礼物給监工、工头，結果也被开除了。

强迫賭博，輸打贏耍：矿里的把头、监工、流氓、特务

結成一伙，開設賭場，強迫工人賭博，誰講半個“不”字，就要挨頓毒打。一九四七年四月，幾個流氓、工頭、賭棍到工人宿舍里強拉工人去賭錢。一個姓周的流氓做庄，次次賠錢，便要起流氓手段來：“你們敢搞我的鬼呀，不行，錢是我的！”嘩啦一聲，把桌上所有的錢，都掃歸己有。有個工人實在忍耐不住，講了句“略算得什麼賭錢囉！”話音剛落，流氓們一把將他抓住，劈面一鐵棍，將他的左眼珠打出掉在地上，頓時臉上血肉模糊，痛得他昏了過去。“他媽的，你還裝死！”流氓們象惡狼一樣又拳打腳踢，工人們拉都拉不住。直打得他全身無一塊好肉，痛得在地上亂滾。打罷又威脅說：“馬上滾出去，不然就要你的命！”這班魔鬼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他只好右手拿床爛席子，左手護住血流不止的眼睛，一步一拐地離開了礦山。

特務幫會，騙取錢財；礦里特務橫行，幫會繁多，經常拐騙工人錢財。一九四六年偽省保安旅派來一個特務，成立偽同業公會，強迫工人參加，每人交入會費三塊銀元，不入不准做工。到一九四八年又來了個軍統特務，組織什麼偽礦業公會，又規定每人交入會費一塊銀元。同時宣布同業公會為“非法組織”，入了的都要“洗手”，並交“洗手”費銀元三塊，否則要抓進班房坐牢。這樣，每個工人就白白地被騙走了七塊銀元。

官僚資本家和把頭、監工的這種血腥統治和殘酷剝削，激起了礦工們的憤慨和反對，工人們經常組織起來，

不断地与他們进行斗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矿工們从阴暗骯髒的井下爬上来，准备洗澡，可是池子里的水却結了一层薄冰。矿工們实在忍无可忍，就用洋鎬、斧子，敲打蒸汽管子，以示反抗。矿长刘伯庵聞信，馬上派狗腿子前来镇压。工人們围着狗腿子讲理，狗腿子理屈詞穷，拔腿就走。在碉堡內的矿警队，竟用机枪扫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四个工人当即倒在血泊里。但矿工們并没有被吓倒，他們昂首挺胸，繼續前进，冲进了刀枪林立的矿长室，占領了警工股。“笑面虎”矿长刘伯庵見硬的不行，便来軟的，首先指使狗腿子放出空气，說烧水的是北方人，想唆使南方人去打北方人，来个南北分化。同时他采取拖的办法，要工人派代表談判。推选代表时，又指使特务混进代表当中。談判一开始，“笑面虎”刘伯庵就皮笑肉不笑地忙着招呼：“弟兄們，真对不起，冷天不烧热水，怎么行呢？我屢次督促有关人員关心弟兄們的生活，哪知烧水人員光偷懶，我一定惩办。”这样，一下就把矛头轉到烧水的工人身上了。特务冒充的代表趁机捧場：“是呀，刘矿长对我们工人本是关心的，只是下面沒很好执行，以后請刘矿长多多督促。”“笑面虎”又进一步开脫罪責：“矿警队开枪，完全是誤会，打伤的人，矿里一定負責治疗……”

这次斗争，因为没有党的领导，被特务破坏捣乱失败了。但矿工們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他們从失敗中吸取教訓，繼續不断地与资本家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特別是一九四五年，黨派來了地下黨員，在礦區里撒下了革命的種子，礦工們象在茫茫大海里找到了燈塔，與資本家、把頭、特務的鬥爭更加堅決了。一九四八年八月，為了反對資方拖欠工資，礦工們堅持罷工達一星期之久，終於取得了勝利，迎來了解放。

.....

礦工們在舊社會所受的苦難，真是說不完，訴不盡。

當礦工們想起過去這些深重的苦難和艱辛的鬥爭，叫他們怎能不加倍熱愛今天的幸福生活！

楊家橋煤礦黨委辦公室

一 张 工 票

請看，这是一张二十年前的工票！

这张工票，是辽源矿务局的职工，不久前去凭吊日伪統治时期被殘害的矿工墓——方家坟时，在一具骸骨胸前发现的。这张工票，因为用蜡紙包着，在地下埋了二十多年还没有烂，而且字迹清楚。现在，它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館里。

这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工票，这是对旧社会的控訴书。它有力地控訴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日本强盜和汉奸把头，对矿工的殘酷压榨和剝削。

现在，我們就看看这张工票上所記載的一些事实吧：

“方家柜”——工票右上角的几个字，是当时辽源矿一家大把头的柜头。这个大把头姓方，叫方明。一九四二年以前，这里还有“董家柜”“譚家柜”“宋家柜”……在这一些柜头中，以“方家柜”对工人的压榨剝削最殘酷。据一些老工人說，人們一旦进入“方家柜”的电网圈，就如同被装进了榨油机。

“康德九年十一月”——工票左上角的几个字。康德，是伪滿时期的年号。康德九年，即公元一九四二年。

康維九年 11 月份

方 家 大 柜

| 工 数 | 30 | 月/日 | 借金 | 物品 | 单价 | 物品 | 单价 | 上月欠金 | 番号 |
|------|--------|-------|----|----|----|----|----|-------|-----------|
| 工賃金額 | 32.34 | | | | | | | 9.38 | 8127 |
| 引 | 共濟金 | 1.20 | | | | | | 本月扣金 | 氏名 牛世清 |
| | 鋪底費 | 2.00 | | | | | | | |
| 去 | 平時賃 | | | | | | | 27.20 | 入伙日 |
| | 抗長費 | .40 | | | | | | | |
| | 伙食費 | 7.50 | | | | | | 應領工金 | 11月 1日 |
| | 飯票 | 12.00 | | | | | | | |
| 金 | 水抹子 | | | | | | | 本月欠金 | 8年 出伙日 |
| | 作业器 | | | | | | | | |
| | 理发費 | .40 | | | | | | 4.24 | 月 日 |
| | 車牌罰 | 1.50 | | | | | | | |
| 額 | 安全灯罰 | | | | | | | 把头 | 開支數 次 |
| | 石炭賃 | 1.10 | | | | | | | |
| | 印章指紋照象 | | | | | | | 經手人 | 領金人押 |
| | 餐具 | | | | | | | | |
| | 事務印刷 | .50 | | | | | | | |
| | 茶金 | .60 | | | | | | | |
| | 衣 | | | | | | | | |

牛世清的工票 (复制)

“牛世清”，这是具工票人的名字。这个人究竟是誰？现在还查不清楚。但是从工票的“引去金額”栏，他被扣去两元“鋪底費”来看，就知道他是被把头从远处招騙来的，只身住在大房子里。又从他被扣去一元五角的“車牌罰”来看，我們知道他是井下的采煤工人。

“工賃金額”，即工資。从这张工票上可以看到，牛世清在十一月份，做了三十天活，只应得工資三十二元三角四分錢。

“引去金額”，即扣去款項。

“共濟金”，这是工人一到矿山之后，从第一次領工資起就开始扣的。每月都按照上一年度全矿职工平均每天工資的百分之五十扣除。

据日本人編輯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記載，共濟金，

是做为工人互相救济用的。这里包括给工人及其家属的医疗费、伤病津贴、归乡津贴、吊慰金（抚恤金）、丧葬费，以及女工或工人家属生孩子的补助等项。但是对工人来说，这完全是一堆美妙动听的空话。工人只有拿钱的义务，没有享受的权利。象牛世清这样的一些工人，有了病连口水都喝不上，甚至有时候，外勤提着镐把走进来问：“脑袋还硬不硬，硬就得下井。”走得慢一点，一顿镐把，打个半死，哪里有人给他们治病！

“铺底费”，即工人被招骗来时，旅途中的花销。那时，把头到外地招骗一个工人，一路上每顿饭只给三个窝窝头。到了矿山，每人再给一个“老虎被”（这种被是用些破布拼凑起来的，象一张满身花斑的虎皮，所以工人都叫它老虎被）、一个草枕头和一个水碗。总起来只不过花二十来元。可把头就把这当作“铺底”，月月要收费。不知要收到何年何月为止。

“炕长费”，就是给看守工人的炕长的钱。工人一进矿，就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一屋有一个炕长。这种大房子，有三十米长，只在堵头处开一个门，由炕长把守。两边是两排通连大炕。炕长可以随意殴打工人，不叫工人吃饭。可是工人月月还要给他钱。

“伙食费”，这是不必解释的。不过据一些老工人说，当时下井工人，吃的是高粱米、豆腐渣和橡子面。再说，每顿饭每人才给两个窝窝头，几根咸菜条。这样的伙食，一个月哪里能用七元五角呢？

“飯票”，当时也叫**“实物引換券”**。据資料記載：这种东西是在一九三三年发行的，有实物工資的性质。用这种飯票，可以在西安矿业所開設的店鋪买东西。据一些老工人說，那里卖的东西，要比街里貴很多。但是貴又怎么办呢，矿山的四周是用几道铁絲和电网围着的，根本不許工人出去，所以只有再受一层盘剝了。

“理发費”，据老工人回忆，在“方家柜”干活的工人，两三个月也理不上一次发，个个头发都是三四寸长，可是月月要扣理发費。

“車牌罰”，这簡直是一个鬼名目，除了把头之外，工人誰也不知道这是扣的什么錢。有人說，当时工人每天挖的煤，不够把头上报的数字，就要罰。还有一說是：工人下井前要領車牌，刨一車煤，往車上挂一个牌。如果升井后，把車牌丢了，就要罰車牌子錢。不管这是扣的什么錢，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們慣于巧立名目，采取一切手段，把工人的血汗錢榨干。

“石炭賃”，就是烧煤錢。那时，烧炕用煤本来不用錢买，可是把头还照样扣工人的錢。

“事务印刷”，即为“方家柜”扣的办公費。

“菜金”，这是过年过节时吃菜的扣款。

在这十七項扣款名目中，还有六項沒扣，是否在别的月份扣去了，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既然立下名目，总是要扣的。从这些名目中也可以看出：工人吃飯用的碗筷、刨煤用的鋤鏟，都是要扣錢的。甚至在为監視

工人而立的規定，如在“指紋登記”上打个手印，也要錢。

写在工票上的名目有这么多。据老工人說，还有許多随时要錢而不記賬的名目，如打預防針、买防空灯罩、“老君爷”过生日，等等，都要从工人身上扣錢。

这张工票載明：牛世清在这个月份里，一共干了三十天活，工資是三十二元三角四分。这十一項扣款，就扣去了二十七元二角，加上上月欠金九元三角八分，不但一分錢沒領到，还欠“方家柜”四元二角四分。这就是一个煤矿工人一个月的总“收入”。

日本資本家、中国的汉奸把头，用心之險恶，手段之殘酷，由此可見！

龔 仁整理

換了人間

在胶济铁路的东端，东起女姑口，西至胶县南的东营，綿亘百余华里的海濱上，布滿了白茫茫的盐池和盐堆。这就是我国海盐产区之一——胶州湾盐場。

看吧，在这大地碧海之間，遍地风車如同雪天里无数朵白牡丹，迎风轉动，媲美爭艳。机房里的抽水机在吼叫，汹涌澎湃的海水馴順地从渠道淌进儲水池，然后經過蒸发池，灌入結晶池，慢慢由綠变白、发固，制成雪白的盐。在这里，真是盐堆似山，盐池如鏡。盐場內，技术組长手持“婆美氏”表，这个盐池量量，那个盐池試試。运盐的盐工們，推着胶輪小車，在阡陌纵横的池埂上，行走如梭。盐場外，专用机車拉着一长列滿載原盐的車廂，沿着专用铁路，馳向全国各地。港沟內船舶密集，不停地把原盐駁运到港口，归坨待运。大家都为建設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奔忙。

但是，解放以前，在这环抱胶州湾的盐田上，有一千六百一十二付盐滩，其中百分之七十被地主、資本家所占有。盐工們受尽了地主、資本家的摧殘。

沉重的劳动

那时盐工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至少干十三四小时，多则十五六小时。老盐工赵同和说：“我在替滩主干活时，早晨两点多钟就要起来，先挑七八担水。担完水，就下滩。一上午捞完一付盐田的盐（约四五吨），装满十五吨重的一只船，还要把捞出的盐抬到坨上。上午干完盐场活，下午还得替滩主干庄稼活，一直干到满天星才能收工。真是：上工下工，两头见星。”

如此沉重的劳动，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很难坚持。王光晓的弟弟，来盐场第一天就累得吐血。有一个姓冷的青年工人，一天上午，在一个一千八百平方米大的盐田里干活。先是推净一百多立方水，再推净池内淤泥，然后用石碾子将池底压光、压硬，放好水。干完活，他往地上一坐就昏过去了。滩主还说他“有意捣乱”，要打要罚。南万盐场曾经有一个叫“乐安人”的盐工，给地主干了三十六年活，最后活活累死在盐场里。

那时盐工下池抬盐，连垫肩、泥袜子都没有。抬着三百多斤重的大盐筐，行走在狭窄泥濘的池埂上。稍一不慎，就有摔伤致死的危险。一天夜里下大雨，把头手执棍棒，赶着工人出去抢捞盐斤。盐工王光晓和孙一正摸着黑捞满了一大筐盐，向上抬时，看不见池埂，一下栽到卤沟里，腿被石碾子划破了一条二寸长的大口子，鲜血直流，

疼的絞心。就这样，还不敢吱声，弄些烂泥糊上，又去搶盐了。那时抬盐，木杠子磨得肩膀上的皮比脚后跟上的皮还厚，要吸烟，掏出火柴在上面一划就着了。两只脚踏在鋒利的盐碴上，被割的布滿了一道道的血口子，再被卤水一浸，疼得直钻心。晚上下了工，得先用淡水把伤口里的卤水洗出来，疼輕了点，才能睡着。

由于劳动条件极端恶劣，防护用品很少，工伤事故也就特別多。盐工負伤后，还得照常干活，伤重不能干活的盐工，还得家中来人頂替，沒人頂替就被开除。地主、資本家規定：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中途下工，就不发工資。老盐工于洪祥，因鬧风車被摔死后，工錢沒給，还得自己家請人抬走埋葬。

殘酷的剝削

地主、資本家对盐工的經濟剝削是非常殘酷的。

盐工上工和下工，一年分春秋两季，从旧历正月十六到六月十六为春季，从七月十五到十月十五为秋季，工資按季定价。旧社会的盐工都是地主、資本家从“覓汉市”（盐場附近較大集市上）雇来的，工資由他們定多少是多少，被雇人无权过問。而且規定春不到六月十六，秋不到十月十五要下工的，不仅不发工資，还要退还飯錢。

那时盐工的工資，虽然以粮食計算，可是，地主、資本

家总是按上工期間最低的粮价，强行把粮折成錢。粮价不断上涨，到下工时領到的工資根本买不出东西来。老盐工王光曉解放前給地主王希武干活，一年工資二百二十斤麦子。并且說定清明节給三升，其他分別在五月端午、八月十五和十月十五給。可是，从正月十六一直干到四月底，再三去要，一粒麦子沒給。一天，家里实在沒的吃，他母亲跑了八里多路，去找王希武要点錢。好不容易叫开王希武的大門，他正在厢房里端着小酒壶喝酒。王光曉他娘在院子里等了好长时间，他才迈着四方步走出来，蛮不讲理地說：“說沒有就是沒有，有錢也不給，剛来嘛！得干干看看。”

“你看在我这老婆子面上，給几个吧！再說，孩子不是在这干了好几个月了嗎？”母亲央求說。但狠心的王希武把小黃胡子一捋，脸色一变：“不給就是不給，別再囉嗦。”說着就叫狗腿子把她赶了出去。

資本家和地主不但不按期发工資，盐工年底下工时，还要扣下一部分工資作“押金”，这叫作“錢保人”或“拴人錢”。地主、資本家就是用这样一条无情的鎖鏈拴住工人的手脚，让工人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为他們卖命。盐工孙再法的父亲，干了二十多年活，每年都被資本家扣去一部分工資，直到老得不能干活回家了，扣去的工資還沒发給。

旧社会，地主、資本家还有一个剝削盐工的手段，就是“干使人”。地主孙茂斋，有四付盐田，一共雇了十个盐

工。他通过打、罰和加重劳动負担等毒辣手段，使这十个盐工沒一个能干完一季活的。孙茂斋过几天打走几个，再从“覓汉市”雇回几个。三年之内，这十个人不知换过多少次，而地主孙茂斋却在这三年内沒花一文工錢就白白收获了四千八百多吨盐。采取这种殘暴手段的，何止孙茂斋一家。在馬戈庄盐場，号称压在盐工身上“四座大山”的孙省山、孙朋山、韓仁山、孙学山，还有其他盐場主，哪一家不是如此呢？有的地主还专门在春季盐場活重的时候，雇用一些“雛巴”（十六七岁，第一次干盐場活的青年）。雇来以后，就百般打罰虐待，迫使这些“雛巴”干到三四个月，即放弃工錢，离开盐場，另寻生路。

过去在盐工中流传着这样几句话：“进了盐場地，好似进監獄，出的牛馬力，吃的猪狗食，什么沒掙着，賺了两腿泥。”

饥寒交迫的生活

那时盐工穷得做不起衣裳。退休老工人刘化瑞，結婚时做了一件夹袄，整整穿了四十年，上面补釘攥补釘，足有五斤多重。孟光悅将他父亲穿了二十多年的一件破夹袄接过来，补了又补，又穿了十三年，称了称七斤多。盐工們既沒有穿的，就更談不上鋪盖了。不少盐工冬天是“身下鋪狗皮，身上盖乱草”。老工人张德礼，干了十几年盐工，才置上一条薄被子，以后又被土匪搶了去。比較

寬裕一点的盐工，晚上两个人合盖一条棉褥子就算不错了。但夜里睡觉和板上釘釘一样，一动不能动，如果翻翻身，两个人还得喊个“一二”，一齐翻。

說起盐工吃的，多半是玉米面、橡子面、地瓜面。就是这些东西，地主、資本家也不让盐工吃好。他們把面买回来，倒在潮湿的地上，泼上污水，在上面喂羊喂鸡，任其糟蹋。直到霉得长毛发紅，才給盐工吃。这种面做出飯来，腥、酸、苦、辣、臭五味俱全，盐工称它为“五香面”。甚至有的地主还把发了霉的橡子面掺上火油，使盐工吃在嘴里，咽不下去，吃一点就鬧肚子，藉以省粮食。

至于盐工的“宿舍”，正象盐工們說的一样：“盐工住窩棚，一天三鞠躬，夏天一湾水，冬天雪飞騰，誰怜蚊虫咬，掙扎熬活命。”这种窩棚，就是在盐滩上挖半米深的坑，用三根木棍撑个架，上面盖些乱草，里面再用土垫个台子当炕。真是夏不遮雨，冬不擋寒，又潮湿，又矮小，爬进爬出，連腰也直不起来。一到雨天，上面漏，下面渗。在夏秋天，窩棚里蒼蝇、蚊子、臭虫什么都有。冬天被留在盐場“看滩”的盐工更是凄凉，寒风一来，几个人蜷縮在一起，晚上冻急了，就把炕挖个坑，下面鋪点草，人躺进去，上面盖上苫。

在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下，有多少盐工們干一輩子穷一輩子，娶不起老婆成不起家。老了被資本家一脚踢出盐場，孤独一人，无依无靠，死于异乡！

盐場新貌

解放后，胶州湾的盐工們，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走上了新生。一九五五年，国家分別沒收、征收了封建所有制的盐田，对資本主义和个体所有制的盐田，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六〇年，就全部成为单一的国营盐場了。

十几年来，党和国家为了減輕盐工的笨重体力劳动，撥出大量資金，增添了各式各样輕便省力的生产工具，和一些現代化的机械設備。經過工人們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努力，調水、提卤已經用上了小型抽水机，抬盐用的大盐筐和杠子，早已被胶輪运盐小車所代替。

此外，还添置了大量的劳动保护用品。工人們工作时的工作服、垫肩、泥袜和胶鞋；雨天工人們身穿雨衣，脚踏长統雨靴，安然地下池作业。炎夏有解渴消暑飲料；冬天有防寒的棉大衣、棉帽子和棉手套等。从一九六〇年到現在，国家支付的劳动保护費用，共达四十一万多元。

何止如此，作为工业的主要动力——电，自一九六一年已經开始使用了。三年来，在盐場的心腹地帶，长达数十里的广闊海岸上，已經形成纵横交錯的电力网，各种型号的电动机愈来愈多地安装起来。雨夜搶捞盐，只要把电門一开，工人們就可以在无数道探照灯的照射下，如同白天一样地精心操作。

随着生产的发展，党和国家从多方面关怀着盐工的生活。为盐工新建宿舍，达二万五千八百多平方米。盐工們从阴暗潮湿的土窝棚，搬进了寬大明亮的大瓦房。現在盐业工人，实行了固定的工資制和八小时工作制，并且全部享受劳动保險待遇。一九六二年以来，国家支付的救济費、养老金即达一千四百二十万元之多。党和国家近四年来，用于盐业职工的各项福利設施的投資共达九十八万元之多。新建了职工食堂、职工医院、保健站、疗养所、澡塘、理发室、托儿所、幼儿园等等。

盐业工人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文化生活也逐漸丰富起来。盐場里，开办了职工业余学校。解放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盐工不識字，而現在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就有两千多名。新建了职工俱乐部、运动場、图书馆(室)和簡易澡堂。工人們的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

广大盐工在党的领导下，挺起了腰板，变成了盐場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当年的老盐工有九十七名已經被提拔为干部，有的当了副場长、工程师。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說不完、道不尽。

中共青島市盐务局党委宣传部

血泪装满“利源”船

厚原 松涛

“一河西江水，半河船工泪；满河血和泪，浮起‘利源’船。”

这是解放前，航行在西江上的船員們血泪生活的写照，也就是利源航业公司老板——“西江航棍”发家的底子。

“指天友”起家

那是黑暗的年代：来往广州与梧州、都城、江門之間的广南、郁南、德南、利南几艘花尾渡，还有十多艘拖輪、木駁船，桅杆上都悬挂着利源公司的旗号，在西江上穿来駛去，显赫一时。对于这家独资經營的船务行，熟悉的人都知道，他那綽号“西江航棍”的老板，原是靠招搖撞騙，买空卖空，騙取貨主运费过日子的“指天友”（航运經紀）。到了軍閥混战的一九二二年，南北軍閥四出勒收軍餉，各乡盜賊横行，整条西江都被“大天二”（土匪）的武装割据。广州至梧州四百二十公里的航程中，就設有“堂口”（土匪

站)七十多处,有些船只不敢航行,这个“指天友”却廉价收买工人的生命,残酷剥削工人,居然“发”起家来。

工人出血 老板賺錢

利源公司抓住軍閥混战的机会,立即动手在那艘租回来的“新新”拖輪上,装上几条“烂背脊”(火药土炮),回乡雇了几个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当“炮手”,打出“实力护航”的招牌,一时生意兴隆,一天收入三百多銀元。可是,几乎每趟航行归来,都有船員被打伤、打死……。有一次,一个姓梁的船員从都城回广州,航經石岩头“堂口”时,被土匪乱枪打死了,尸体用草席裹着,放在船尾的小艇上,拖回广州。清晨,船刚泊芳村碼頭,死者家属拖男带女在那里等候了,看見亲属尸体,猛扑过去,哭得死去活来。利源公司老板慢吞吞地走过来,假惺惺地安慰說,“生死有命,何必那么伤心。”說完便揮舞“拐杖”,拖着肥胖的身軀,搖搖摆摆地走开了,好象看見死了只狗一般。

利源公司装滿了工人的血,于是一条一条新船下水了。

“压沙輪”有食无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西江航运曾經一度出現“黄金时代”,大批外逃的难民,都急着要坐船重返家园。利源公

公司的老板一看发财的时机又到了，立即租了一艘較大型的木駁船，改装为两层的花尾渡，經營起“定期班”客运。

利源公司的花尾渡，向来以“船員众多，招呼周到”招徠旅客，有时一艘花尾渡上，竟有船員近百人。是资本家大发善心，安排工人就业嗎？当然不是。那些在船上被叫做“压沙艙”、“細路”、“餐仔”的船員，都是“有食无工”的，而他們的伙食，也照例是由船上厨房部包起来，把船員的伙食費轉嫁在旅客身上，老板不用多花一分錢。

那些廉价劳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每逢过年过节，老板回到村里，大吹大擂，說他船上的生活如何如何好，引誘一批又一批走投无路的青年农民，跟他出去“撈世界”。这些青年农民上船以后，每天除了洗刷船只，为旅客端茶送飯以外，还要搬运行李，装卸貨物。夜里就睡在船艙板、貨堆上，甚至厕所的門旁。一天累到晚，可是連一分工資也沒有！一九四七年夏天，一个上船不到一年的“压沙艙”，因为睡在船旁的艙板上，輪船顛簸，跌下江里淹死，死后連半分錢的安家費也沒有！

拖工資 肥自己

滾滾的西江潮水，一天两次冲击着两旁的堤岸，“有食无工”的船員，血泪洒滿西江。那些所謂每月有固定工資的船員（一般按行規定职的船員），日子也并不好过。拖欠船員工資，又是老板剝削工人的另一“花招”。他时常

說：“都是一家公司的人嘛，有拖无欠，迟几天发工資算得了什么？”那时候的物价一日三变，头場电影票价每张五百万元，二場随即涨到每张一千万元。很多老海員今天回忆起来，还清楚地記得：有一年农历年三十晚，已經是十一时多了，老板得知金圓券贬值，立即叫人把金圓券連夜抬下船去发工資。船員們一觉醒来，手上那些十万元面額的金圓券，早变成沒用的“湿柴”了。

就这样，船員們的血汗被榨干了，“西江航棍”的腰包却一日比一日鼓脹。解放后，船員們和他算帳，利源公司拖欠工人的工資总額，把全部船只变卖了也不够偿还。

利源航业公司老板一个人的发家史，不正是千百个海員的血泪史嗎？如今，这一切苦难，都象滾滾的西江水，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资产階級殘酷剝削工人的罪证，却是我們永远也不会忘記的。

在徒工的白骨上……

一进入青島华新紡織染厂的大門口，便能看到一处极为美丽的花园。誰能想到，就是这座花园，在四十多年以前，却是一处阴森森的“艺徒”坟地啊！几位曾当过徒工的老工人，对当年“华新”的一千二百多名徒工的悲惨遭遇，仍然记忆犹新。

謊 騙 招 工

四十多年前，在黄河岸边利津一带，正当大批灾民走投无路的时候，“华新”的老板們派出大批爪牙，勾結当地官府，来到灾区，大量招收徒工，美其名叫“艺徒”。資本家在招工布告上写着：艺徒进厂以后，半天做工，半天上学，吃大米洋面，穿洋布新衣，住瓦房洋楼。七天一休假，每月工資五块“大头”。一年出徒，出徒后工資最少三十块“大头”……他們把徒工的待遇說得天花乱墜。

陷于絕境的灾民們，虽然半信半疑，但是，眼前走投无路，为了找条生路，当父母的含着眼泪，把自己的孩子送給了招工賊。

华新紡織染厂的資本家就这样趁火打劫，用欺騙的手段在广大的灾区招收了一千二百名廉价劳动力。这些可怜的小徒工，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他們跳出了苦海，又陷进了火坑。

囚徒生活

这一千二百多名小徒工，被老板用馬籠車一批批地运来了青島。象犯人一样，被厂警用刺刀押进了工厂。进厂以后，他們换上了厂里专门用花包布做成的黑衣服，衣服的袖口上鑲着一道一公分寬的蓝杠。徒工們穿上这种衣服，就象犯人一样，被拴上了一条鎖鏈。

徒工們住的不是什么瓦房洋楼，而是一些又窄又矮的黑屋子。屋內有两条用土堆起来的大土炕，每間屋睡八十多个人。屋頂上仅一层薄瓦，遇到下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每間屋子仅有一个小門，两个小窗，窗上还釘着几根粗铁棍。屋子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墙門口，日夜都有厂警站崗。这哪里是宿舍，簡直是座牢房。

一到数九寒天，每个徒工只能从資本家那儿，領一床用花包布和落脚棉做的小薄被子，有盖的沒鋪的，到了夜里，孩子們都冻得睡不着觉。有一次，小徒工刘守，夜里冻得起来坐着，嗚嗚咽咽地哭爹喚娘，被查夜的“看号司”听見了，进去抓住小刘的头就往墙上撞，一連撞了五、六下，連吵带罵的将刘守的被子甩到院子里。刘守被撞得

头破血流，浑身冻的直打哆嗦，等“看号司”走远了，才偷偷地把那床冰凉的破被子捡回来。从此以后，夜里再冷也没人敢出声了。

到了夏天，屋子里人多，加上又矮又潮湿，一进去就象进了蒸笼一样。屋内的蚊子、虱子多如牛毛，徒工们没法睡觉，个个都长了满身的脓泡、疥疮。更残酷的是，老板怕夜里有人乘上厕所的时候逃跑，便索性将便桶都放在屋里，门上加上大锁。弄得满屋子又臊又臭，没法喘气。一个叫吕正田的气极了，便骂道：“他妈的，把我们当成了牲口啦，拉屎尿尿都管起来了。”骂声没完，门上的锁哗啦一声开了，突然闯进来一群“看号司”，一顿鞭子当场把吕正田打得昏了过去。吕正田被打以后，一直躺了二十几天才慢慢能动弹了，腿上却留下了一片片伤疤。

徒工们每月的工资不是五块“大头”，而是三角钱。就是这微不足道的三角钱，也不顶三角钱用。资本家真是鸡眼睛里算出米粒来，他在厂里开设了一处所谓“福利”商店，卖的日用百货都比外面贵几成。工人的工资每月不是发现洋，而是发给只能在他们开的商店里才能用的“华新票”。这样一来，每个徒工只好眼睁睁地叫资本家再剥去一层皮。

徒工们吃的不是大米、洋面，而是些发了霉的杂粮面饼子。饼子里有草、有麻袋毛，还有砂子、虫子，吃到嘴里又苦又涩，真难下咽。就是这样的饼子，也不让吃饱。可怜的孩子，只好泪水拌着饼子，强咽下去。吃饭时，一

边干活一边吃。那时車間里花毛飞滿天，有的小徒工把餅子放在車头上，巡迴一趟咬一口，不等吃完，餅子都成了棉花团团了，不少人因此得了病。小徒工們过着这样的非人生活，进厂不到三个月，就被折磨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

不但飯吃不飽，干了一天活，連喝口水也不容易。車間里只有一个两米来高的开水鍋，喝口水要費半天劲。把头一看工人喝水，就說耽誤了生产，因此，不知有多少人，因喝水挨过打，有的甚至送了命。有个叫尹之清的小徒工，因为头天晚上泻肚子，第二天勉强支持着上了班。干了一会活，便觉得口渴、嗓子眼里直冒烟，趁把头不在，偷偷拿着碗去舀水喝。他拖着病身子，費了好大劲才摸到水鍋边。这时，鍋里的水已經被蒸气烧的滚开了，正冒着热气。小尹刚想探下身子去舀水，只觉眼前发黑，一头就栽进了鍋里。徒工們聞声赶到，扯着腿把他拖了上来。可怜的孩子疼瘋了，他一面嚎哭，一面奔跑，跑了十多步便栽倒在地上，立即咽了气。

狠心的老板，不仅夺去了徒工在厂內的自由，就連千里以外的亲人也被隔絕了。他們勾結地方官府，按照“合同”上規定的条款，在徒工学徒期間，一律禁止徒工家屬的探訪。不知有多少父母为儿子哭断了肝腸，急瞎了眼睛。有一个叫王金堂的徒工，从他离乡后，父亲就染病不起，因无錢医治而死去了。他母亲埋葬了老伴，带着小女儿，到青島来找儿子。她們沿路討飯，餐风飲露，走了一

百多天，在半路上小女儿又餓死了。这位母亲忍着悲痛，拖着沉重的双腿，好歹爬到了华新紡織染厂。老人含着眼泪向厂警打听，希望馬上能看見自己想念已久的儿子。可是，这狼心狗肺的厂警不理睬她，不让她进去。老人苦苦哀求，厂警反而大怒，道：“你的儿子早已死了！”老人一听，信以为真，她一下子昏倒在地，苏醒过来后，絕望的双眼，滿含着泪水，两眼直瞪着大铁門，不住声的叫着儿子的名字，一头撞死在华新紡織染厂的大铁門上。这位飽受旧社会苦难的母亲，用自己的死，向那吃人的资本家作了最后的控訴。

殘酷迫害

徒工們在衣、食、住、行上所受的虐待和剝削，已經够凄慘的了，但最凄慘的是，资本家还私設刑堂，制訂了一大套所謂“厂規”，他們可以任意打、杀，甚至活埋那些他們认为违犯厂規的徒工，皮鞭、大板、“板房”，天天陪伴着他們。这些无辜的孩子們，有的被折磨成殘废，有的被害身死。細紗車間有个叫曲有的小徒工，扫地时不小心，碰了一下陈領班的褲角，當場被这个姓陈的狠狠踢了一脚，将瘦小的曲有踢在車底下，碰得头破血流，半天沒喘上气来。从那以后，曲有成了殘废，沒活几年就死了。徒工戴安乐，有一次不小心搖坏了一点点紗，就被罰在車間的洋灰地上跪了四个多钟头，两个膝盖都跪肿了。

徒工們在如狼似虎的領班們眼前，不敢說个“不”字。有一天，一个叫呂嘉林的徒工，干活时和一个領班頂了一句嘴，除了當場被領班抽了一頓鞭子外，还被罰干連班（一連干二十四小时）。呂嘉林湯水沒进，疲劳不堪，干到二十多个小时的时候，实在支持不住了，身子一歪，正碰到皮帶上，霎时被皮帶卷上天軸，甩上了半空，被甩得粉身碎骨。領班发现停了車，过去一看，一声冷笑，捂着鼻子就走了。

徒工們受不了这般非人的虐待，便千方百計的想法逃出虎口。有一天下大雨，被押解去上工的徒工，趁机逃走了七十多个。可是王德成和张龙两个小徒工，沒跑得掉，被抓了回来。資本家为了杀一儆百，把全体徒工都召集在一起，當場把他俩倒剪双手吊了起来，用皮鞭、軍棍打的死去活来。打完后，資本家恶狠狠地对全体徒工說：“今后誰再逃跑，抓回来格杀勿論！”徒工們把奄奄一息的小伙伴抬回宿舍，不到一天，他俩都死了。

慘 遭 橫 死

飢餓、劳累、皮鞭，夺去了徒工的健康，生病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資本家哪管徒工的死活，他們玩弄假慈悲，从外边弄来一个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大夫”，給徒工們看病。这家伙仗着和資本家有私人关系，干拿比徒工高五十倍的工資，他根本不懂医术，給徒工們看病，輕病治

重，重病治死。一見有看病的，就皺起眉头罵道：“又长猪瘟啦！給我滾过来。”說着胡乱一摸，順手甩給一包早已准备好的药。不少有病的孩子，吃了他的药，病越发重了，有的甚至被毒死。因为他姓潘，大伙气的都叫他“潘蝎子”。有个徒工叫黃延福，第一天发烧，找“潘蝎子”看了看，弄了付药吃，結果第二天病的不能动弹，第三天便死了。死的时候两眼大睜，遍身发青，鼻子、口里淌血，很明显是吃药中毒而死。从此，徒工們有了病，宁肯死挨死等，也不找“潘蝎子”看。这样一来，正合了資本家的心意，不求医生就不是真病，就得給我干活。因此，很多得了重病的徒工，被监工的鞭子逼着走进車間，拼死咬着牙强干，勉强支持。有的支持不住了，一头倒在車間里，便人事不省了。

一到夏天，由于生活条件低劣，徒工們很容易染上传染病。有时一場流行病，便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資本家生怕徒工都死淨了，沒有給他們干活卖命的，便設了一个“休养間”。徒工一有了病，就被抬进“休养間”隔离起来。那种休养間，实际上是一个“停尸房”、“活杀場”，只要进了休养間的門，就别想活着出去。每隔两天开一次門，往外抬死尸。更殘忍的是：有的徒工还没有死，就被放进薄皮棺材，活活埋掉。一个叫刘士和的徒工生了传染病，还没死，就被硬装进了棺材。往里装的时候，他还搖摆着手，喉嚨里还有微弱的“哼哼”声，鼻孔里还有一絲热气。可是殘忍成性的資本家，哪管你这徒工的生命呢？

在殘酷的資本家的剝削、壓榨、折磨下，一千二百多名徒工，一天天減少了。不到三年時間，就被折磨死了三百九十多人。在埋葬徒工的墳地上，小土堆一天天多了起來。

在徒工的白骨上，資本家却大發橫財，建立了一座又一座的新廠房。

王信敏整理

紡織工人的血泪

我們杭州第一棉紡織印染厂从开办到現在，已有七十四年的历史。它的前身是通益公、鼎新、三友实业社和杭州第一紗厂。提起工人在旧社会里吃的苦，我們厂里老工人就火上心头。在一次座談会上，老工人以亲身經歷，控訴了那些喝人血的資本家和那万恶的旧社会。

从前的紗厂什么样

旧社会，我們紗厂工人被叫做“紗厂鬼儿”，挨打、受罵簡直是家常便飯。資本家为了盘剝工人，制訂了許多罰規。鼎新紗厂时期，厂里規定：工人“折断一只木錠罰二角”；“打碎一块玻璃罰四角”；“在厕所內吸烟，罰一元”。更加莫名其妙的是，工人說句笑話，也要“罰洋五角”，而当时的每日工資只有六分到一角六！資本家的走狗——督工、监工、巡查、領班、指导員、“拿摩溫”等名目繁多的工头，也一起参加剝削和压榨。逢年过节，或者假藉紅白喜事、阴寿阳寿等名义，敲詐勒索，硬要缺衣少食的工人向他們“贈送”厚礼。送得少的，就調你去做难做

的生活，不送的，不出三日，就会无中生有地找个借口把你赶出厂去。要说这种剥削有多重，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有个恶工头，用这种年节的“礼物”作本钱，竟在拱宸桥开起了一片棉布店！

为了多剥削，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地延长工作时间。从通益公纱厂到杭一纱厂这五十多年中，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十二到十六个钟头。吃饭不停车，工人只好站在车头边，接几个纱头扒一口饭。有时纱头断得多了，等接齐，饭上早已盖满一层醜醜的飞花……真是不吃肚皮饿，吃下泪成河啊！

资本家的心在铜钱眼里翻跟斗，那时的车间，劳动条件坏到了极点。厂里根本没有任何降温设备，夏天车间里热得象蒸笼，工人常常热昏过去。冬天，狡猾的资本家，一面发给每个工人一个红萝卜，说是“预防伤风”，一面暗地里却增加车速，累得工人喘不过气来。

野蛮的抄身制

从通益公纱厂开工的那天起到解放前，“抄身制”就象毒蛇一样，紧紧地缠在我们工人身上。资本家豢养了一批抄身婆和抄身汉，在厂门口安上抄身栏，栏的旁边放着一只木笼。男女工人每天下班出厂的时候，一个个都要被浑身搜查。如果有谁违犯“厂规”，就被关进木笼。资本家为了对付工人，还制造了各种刑具，订立了罚款、开

除等等条規。真是不把工人当人看待啊！

在日本鬼子侵占杭州的时期，細紗車間有个女工叫阿八嫂。下雪天沒有棉鞋穿，两只脚生滿了冻疮。她在地面上拣了些烂棉絮包在脚上，再用些棉紗头和布条条儿捆上。想不到被抄身婆搜出来，她竟遭了大难。那是风雪滿天的腊月天，日本鬼子把她的衣服剥光，吊在厂門口的一棵大树上。每一个日本鬼子經過这里，都要打她一頓。

迫害工人的事情，差不多天天都可以看到。藤条、木棒等等刑具，一年到头挂在大門口，或者捏在抄身婆和抄身汉的手里。工人出入厂門，看到这番阴森森的景象，都气得咬牙切齿。要是有人一不当心，把火柴或者紙烟放在衣袋里，到門口被搜出来，就会先挨一頓藤条，然后，一根火柴罰洋五角，一支烟罰洋一元。特别是童工，那还是些不大懂事的孩子，她們买不起花袋，干活时就把一些接头用的棉紗塞进袖管或衣袋里。干上一天的活，累得小腿和胳膊都不会动弹了，哪里还会把这些事情想得那么周到呢！下班忘了把棉紗拿出来，叫抄身婆搜到了，不是挨打受罵，就是脸上被塗上柏油，帶到各个車間去“示众”。資本家还說这是“从寬发落”呢！

被摧殘的儿童

鼎新紗厂的資本家为了更多地剝削、压榨工人的血汗，竟雇用了近半数的八岁到十二岁的童工。童工的工

資特別低，當時一般工人每天工資不到兩角錢，童工只有六分到八分。當時的米價，五六元一担，童工要想吃飽飯就更難了。

一九一五年六月大伏天，車間里悶得象蒸籠一般。童工陳阿冬，有氣沒力地在細紗車弄堂里接頭、掃地。因為吃不飽，加上天氣特別熱，生活難做，她的車子“堆爛污”了。童工頭麻婆阿鳳看了，拿一個筒管直向她的額角打去，頓時鮮血直冒，疼得阿冬渾身發抖，可是還不敢哭出聲來。

麻婆阿鳳站在阿冬的旁邊，老是盯住她。她這天身體正發燒，吓得飯也不敢吃，手也發抖了。她拔起一根紗來接頭，往錠子上插時，不料又落到地上。麻婆阿鳳“拍”的一個耳光打去，還罵道：“死坯！你不想做了，罰洋三角！”馬上，一塊罰款的牌子就掛在她的車頭。這塊牌子象一條鐵鏈套在阿冬的頭上，她越來越感到沉重，連一步也邁不開。她驚慌得不得了，就暈倒在“弄堂”里。

在工人群眾的抗議下，麻婆阿鳳才准許阿冬回家去休息。可是走到半路，她就跌倒在路旁的一丘田里。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人們發現了阿冬的屍體……

這是解放前不久的事：一個炎熱的夏天，童工桂珍的媽媽得了嚴重的傷寒症，還只十五六歲的小桂珍，就得擔負起一家的生計。她除了要照顧病重的母親以外，連星期六也要趕到廠里去上夜班。因為資本家為了多壓榨工人的血汗，每星期六晚上，就以發給加倍工資和供應一餐薄粥夜點等詭計，來誘騙工人連做一個夜班。工人為

了多掙两个錢糊口，又不能不硬着头皮去做。

因为白天疲劳到极点，桂珍做起夜班来，耳朵里老是嗡嗡地响，眼前金星直冒，突然，一头栽倒在弄堂里。“拿摩温”看到了，凶狠狠地跑过来踢了两脚，吼道：“又在装死啦！要死，就到家里去死！”

隔弄車上的阿大姐看見惊叫了一声，等到工人们聞声一齐奔过来探望时，可怜的桂珍已經断了气。

被旧社会夺去生命的童工，何止百个、千个、万个阿冬、桂珍啊！

阿三娘的經歷

我們厂里有个阿三娘。阿三娘姓陈，原名陈素香，現名陈阿三。可是解放前，她却叫董阿三。为什么改名換姓？这里也有一段辛酸史。

三十五年前，阿三娘——陈素香在三友实业社杭厂做工。那时，女工連生仔兒的权利也沒有，怀孕就象犯罪。有的怕敲破飯碗，只好偷偷地用布把肚子裹紧，恶心嘔吐都得背着人，熬到足月，仔兒往往偷偷生在厕所里。可是仔兒一落地，除名的威胁就紧接着落在媽媽的头上！有一年秋天，陈素香生下了一个仔兒。为了生活，为了少挨些工头的皮鞭，为了避免“除名”的禍殃，沒等滿月，她就搖搖晃晃地上工去了。

不料，刚要走近自己做慣了的那部車，工头迎了上

来。他板着脸，阴沉沉地对她说：“陈素香，帳房間有請。”

她带着恐惧的心情走进帳房間。戴眼鏡的管事抬了抬眼，假笑着說：“恭喜恭喜，有孩子啦，那要好好照管啦。好吧，你从今天起就别来上工了。”……

陈素香被除名的消息传到了工友們耳朵里，个个不安，人人不平！她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因凑巧前几天有个叫董阿三的女工病死了，工友們就設法掩护着陈素香，让她頂着董阿三的名字去上工。可是，董阿三头頸生着一个瘤，陈素香为了瞞过工头的耳目，只得天天用紗布裹着头頸来上工。靠着阶级兄弟姐妹的扶持，陈素香还没有在苦海里淹死。不过她从此失去了自己的真名实姓。

阿三娘出生在一个十分貧苦的絡絲工人家里。父亲的工資很低，根本不够一家人喝粥。她八岁就去給人放牛、抱伢儿，十五岁进袜厂做工。从清晨搖袜到半夜，瞠眈得常常几乎把头撞在袜車的鋼針上！每天得到的工資，一角錢也不到，可是，又是押金，又是租金，連蜡烛头也要自己出錢买。弄得只够喝点連壳的麦糊，吃点胡蘿卜。已經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一年四季，渾身上下还只有一件討来的破棉袄，一条破单褲。

結婚后，夫妻两人做工一双苦，还是誰都維持不了誰。她一无錢送礼，二无“牌头”可靠，整整当了八年“老飯桶”，工头們还不許她学技术。有一次，她想偷偷去学，一下軋伤了手指头。恶工头根本不管她手伤如何，先一口咬定她弄坏了車子，罰了她二角八分錢。她等于白白

做了四天工！

一九四六年，她丈夫被无理解雇，生活的重担便落在她一人肩上。那年冬天，她那个七岁的儿子病了，家里穷得连一粒米都没有，哪有钱去看医生。不几天，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了！……

这桩不幸的事情，使她伤心到极点。她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可是养活了几个呢？连刚死的儿子在内，已经有七条小生命被夺去了！仅仅剩下这独根苗苗，能不能活？她真不敢想啊！

冬天对劳苦人民特别冷啊！刺骨的西北风，吹进阿三娘空荡荡的小屋里，里面有什么呢？借来的三块铺板，搭了一张床，破帐子补得象马蜂窝似的，一条又薄又破的旧棉絮。此外，两只高脚凳，一只破饭篮，几只饭碗，还全是工友们送的。还有没有呢？还欠了人家八十块钱！这就是旧社会一个女工的三口之家的全部“财产”。如果没有工友们的帮助，让她顶着死人的名字，去挣那几个勉强糊口的钱，就连这些破家什也保不住呵！

直到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阿三娘才真正翻了身，恢复了自己失去多年的真名实姓。从此，阿三娘开始了新的生活。

婴儿地狱——“小人监”

“生儿苦，喂奶育儿更叫苦！”解放前，我们纱厂里哪

有什么托儿所，侥幸生下来的伢儿，也只好偷偷摸摸地带到車間里来。

一天，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一卷笨重的粗紗，突然掉进了紗籬，恰恰打在女工长云嫂的伢儿的胸口。当时，車間里声音嘈杂，生活又紧张，誰也沒有注意到。好容易盼到落班，长云嫂抹掉头上的汗水，匆匆伏下身去抱伢儿。这时，她才发现伢儿的身体已經冰冷、僵硬了！

这样的惨事，屡次三番地发生。狡猾的资本家眼看这样下去，将会激起工人们更大的愤恨，才勉强办起个放伢儿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阴暗潮湿，又闷又臭，只有三块鋪板，两个雇来带伢儿的瞎眼老太婆。此外呢，筒管、破油花，以及杂七杂八的东西，东倒西斜地堆满一屋。所以工人们都把这个地方叫做活地獄——“小人監”。

夏天，“小人監”里燙得似火燎，蒼蝇叮满伢儿的面孔，蚊虫咬肿伢儿的手脚。冬天，又冷得要命，伢儿冻得哇哇哭，小手象个紅萝卜。尿里臥，屎里睡，真活受罪！女工一天做十几个钟头工，这么长的时间，只可以去喂一两次奶。多去一次，就会挨“拿摩温”的痛罵。

織造女工黄宝林有个女儿放在“小人監”里。每次喂糕糊的时候，碗里总少不了几十个螞蟻。有一次，上班的时间快到了，她喂完糕糊，来不及給伢儿抹抹嘴，就走了。等到她下班后去抱孩子时，只見伢儿滾在鋪板里角已經哭不出声了。她把伢儿抱起一看，嘴边黑糊糊的一圈，全是螞蟻！就这样，这个伢儿不到四个月，就活活地

被折磨死了！

有一次，女工徐蓮珠做夜班到半夜，已有六个多钟头沒給伢儿吃奶了。这时，小姐妹也來告訴她，說她的伢儿在“小人監”里哭得很厉害，蓮珠就奔去給伢儿喂奶。她剛跑进“小人監”，抱起伢儿換好尿布，喂了几口奶，“拿摩溫”在外边就叫了：“徐蓮珠！你这么久在干啥？車子关起来，損失你来賠嗎？”蓮珠答应着，不忍看伢儿餓坏，就偷偷把他带进車間，放在一个破籬里，上面盖了一块布。

徐蓮珠正耽心給“拿摩溫”看見要挨罵，忽听得伢儿哇哇地大哭起来。她連忙跑过去，低头一看，不禁渾身顫抖起来。原来一个粗紗車上的“秤砣”从車上掉下来，正打中伢儿胸口。她急忙拿掉“秤砣”，拉开伢儿的衣襟，只見白嫩的胸口上，黑紫紫的一块烏青，有碗口那么大，伢儿疼得四肢乱伸。蓮珠心慌意乱地抱着伢儿去請假，“拿摩溫”連看也不看，冷冰冰地說：“咄！这点小毛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打門票（請假）沒那么便当！”

徐蓮珠說：“我不能眼看伢儿活活疼死啊！”“拿摩溫”獰笑着說：“死掉倒是福气，恐怕死不了。”徐蓮珠没办法，只得又忍痛把伢儿放在“小人監”。

下班的汽笛声一响，徐蓮珠連身上的飞花也不揮，象飞一般地跑向“小人監”，輕輕抱起伢儿，又一口气跑到大門口。大門口等待抄身的队伍排得长长的。徐蓮珠挤上去，恳求地說：“我伢儿压伤了，让我先走一步吧！”

抄身婆向她瞪了一眼，狠狠地把她一推，說：“什么伤

不伤，我管不着。快去排队！”蓮珠险些被她推倒；怀里的伢儿碰着了伤口，又亮着沙哑的嗓子哭了起来。

出了厂門，徐蓮珠急忙赶到家，为了給伢儿看病，好不容易向邻居借了点錢，可是錢不够，医院不給治。到了夜里，伢儿突然全身抽搐，眼珠眨白，小眼角里流着一串串泪水。过了一会，就在媽媽的怀里断了气……

解放后，我們工人彻底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在旧社会受苦最深的老工人，大多成了生产上的骨干和闖将。只有这些人，才真正懂得“解放”这个詞的含意。党不仅关心我們的生产，对工人生活，照顾的也无微不至。我們厂里的托儿所办得很好，产妇和伢儿都得到了照顾。解放前在“小人监”里死了女儿的黃宝林，一九五三年生了个男伢儿。因为先天不足，又缺奶水，这伢儿长得很瘦。想不到在托儿所阿姨們的細心照料下，沒多久，伢儿就漸漸地胖起来。黃宝林高兴得逢人便說：“多謝党，多謝社会主义，多謝工厂托儿所，常給我們女工这么大的福气！”受尽階級压迫和剝削的徐蓮珠，解放后她的女儿也在我們厂里做工。她女儿生的伢儿，长得象小老虎一般健壮。徐蓮珠常到托儿所去看外孙，听到小外孙亲热地叫“外婆”时，她禁不住流下热泪，激动地說：“过去的孩子如草，現在的孩子是宝。多亏党和毛主席的領導啊！”

中共杭州第一棉紡織印染厂委员会

絲織世家

苏州振亚絲織厂成品車間
党支部書記兼主任 蔣林生

每当我看到我那大女孩蔣惠珍，同厂里的姑娘們一起，在瑰丽多采的綢緞織机間，象穿花蝴蝶般輕捷地来回操作时，我心里便象吃了蜜一样感到甜滋滋的，深深地为年青一代愉快的劳动、幸福的生活而高兴。

不过，說出来恐怕有人会不相信，在解放前，我曾經发誓，将来孩子长大了，不論做哪一行，也不让她学絲織这手艺。为什么解放前打定主意不让她做絲織手艺，而解放后又会为她做这手艺而感到高兴、感到幸福呢？这里面有这么一段緣由：

“人进机房 牛落磨房”

我的老家在吳县唯亭戈巷。这个村子有三百多戶人家，都是靠織綢为生，我家从我祖父起，就做織綢这手艺。那时，在絲織行业里，有所謂“大叔”、“二叔”、“三叔”三种人。“大叔”是在城里开絲帳房的大商人；“二叔”是接受

帳房加工代織、開設机房的老板；“三叔”就是赤手空拳靠劳动吃飯的織綢工人。我祖父做了一輩子的“三叔”，头頂人家瓦，脚踏人家地，家里穷得連老鼠也搬了家，他很早就积劳成疾飲恨去世了。我父亲蔣銀泉，有一手出色的手艺，既能織素織物，又能用七八把梭子、七八色緯綫，織彩色花緞。他織出来的綢緞，老板送到苏州“大叔”那里，驗貨先生只要听說是“蔣銀泉織的”，連貨也不要看，就收下了。我母亲也有副好手艺，既会捧花，又会掉絲。两个人起早摸黑替老板干活，但是，掙来的錢，却养不活儿女，不得不先后把我兄弟姊妹，送人的送人，当童工的当童工。我就是在九岁的时候，被送到唯亭一家机房当学徒的。

那时，我們絲織工人有句俗話，叫“人进机房，牛落磨房”，絲織工人的生活就和牛馬一样。特別是当学徒，那更是苦水里头泡苦瓜。一进厂門，先要立下“关书”，白紙黑字写明：帮三年，学三年。六年当中工資不給分文，如果中途离厂，还要追回飯錢。当徒工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身，晚上要做到十一二点钟，行动稍微慢了點，老板、工头拾起織机上的坐板、梭子兜头劈臉就打。我好不容易熬到第六年，那年隆冬，大雪紛飞，我身上穿的单薄，受冻挨餓，就病倒了。过了几天，一位老师傅跑来告訴我，“老板准备另外找人了。”我早就料到有这一着，資本家每每看到徒工快滿师了，滿师以后，要給工資，不合算，就鸡蛋里头挑骨头，找个岔子把老徒工辞掉，另找新徒工。我越想

越气，挣扎着起来，想去和老板评理，但只觉眼前金星直冒，一个跌冲，便昏倒在床上了。

“刚出虎口 又进狼窝”

狠心的“二叔”把我解雇后，父亲又托人把我送到苏州一家绸厂学开电力织绸机。我在这家厂里学了三年，满师后，老板又要我做三百丈丝绸作为“谢师礼”，并讲明只给一半工资。我说：“这三百丈谢师礼，关书上没有写，再说，我是带技术进厂的学徒，不能按一般学徒算。”谁知老板根本不讲理，说这是他的厂规。我不服这口气，一脚跑了出来。

那时，我的父母亲都失业在家。我在苏州找不到工作，心想，自己学了九年手艺，单身一人，总不至于混不过去。于是，跑到上海，各处托人送礼进了天德绸厂。谁知“东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也要吃人”，天德绸厂老板的手段更毒辣。老板看厂里机器陈旧，经常坏机停台，捞不到多少钱，便想出了一条鬼主意，硬要我们工人做“包机生活”。就是由厂里给原料，工人拿计件工资，每天向老板交租机费和房金。但是旧机器经常一连几天坏机停台，做不出活来，却还要照常出租费，几个月下来，我们工人的衣裳都进了典当铺，一个个被刮得叫苦连天。眼看再干下去，就要饿死在上海，只好卖了行李做盘缠，又回到了苏州。

剛出虎口，又進狼窩。上海老板用的是“一刀砍”，蘇州老板使的是“千刀割”，他們想尽办法來剝削工人。比如，我們拿計件工資，是按尺計工錢，老板在量綢緞時，手指就往尺梢摺出許多，這叫“摘尺”。他們還私造了一種比標準尺長一寸多的“海尺”，用來量綢。後來碼尺改公尺，明明公尺比碼尺長五寸，可是，每公尺綢，老板還是按一碼綢的工資計算。就這樣明搶暗偷，工人一天的工資就要被刮去近兩成。此外，資本家動不動就要罰工資。如我在一家姓陳的綢廠織“錦地綢”，一次，綢面上出了一個疵點。一個疵點請人修理一下，也不過幾分錢，可是，資本家却罰了我五角。就這樣七折八扣，那个月的工資，幾乎被罰去一半。有些弟兄往往被罰得整天甚至整月為資本家白白勞動。當時在絲織工人中流傳着這樣一首歌謠：“倒貼工鈔自吃飯，進出門檻滾鴨蛋（工作沒保障），一世做得腰背彎，到老還要晒門板。”真是道出了絲織工人的辛酸遭遇。

一分錢工資的鬥爭

在姓陳的一家綢廠蹲不下去了，就跑到蘇州延齡綢廠做工。這家廠的老板是出名的老刮皮，別的不說，單是我們生產的一種“延齡呢”，規格明明和其他廠生產的“大偉呢”一模一樣，可是，每公尺工錢就要比“大偉呢”少一分錢，每個人每天就要被他刮去一角錢。我們當然不依，

要求和“大伟呢”工价平头。誰知增加一分錢，就象要抽資本家一滴血，增加工資的要求被拒絕了，我們決定罷工。

我們工人窮虽窮，可是有义气，在罢工期間，大家挑酒釀担、卖五香豆，把掙来的錢，三一三十一，十二个弟兄平均分。其他厂的弟兄們也都节衣縮食，省下錢来支援我們，我們斗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轉眼冬去春来，黄霉季节快要到了。老刮皮看到机上的經絲受了潮，怕霉烂掉，便偷偷地另找了几个个人，在夜里干活。这事被我們知道了，决定警告警告他。一天深夜，車間里正灯火大亮、机声隆隆，我和几个弟兄跑到厂門口，拾起磚头，乒乒乓乓，把玻璃窗砸得粉碎，車間里頓時灯熄机停了。

第二天，老刮皮报告了敌伪警察局，把我們的組长华根和抓了去，关在牢里。这时，老刮皮又施出詭計，假惺惺地差了个狗腿子，带着魚肉去看望华根和，想軟化他。老华一看，心里光火，拿起飯碗就朝狗腿子砸去，罵道：“誰要你鬼討好，我就是餓煞在牢里，也不吃老刮皮的东西！”當我們派人給老华送点心时，他笑着說：“你們不要着急，我才心定呢！这出《捉放曹》的戏就要他們演給我看。”

老刮皮串通警察局逮捕工人，原想抖抖威风，好让他的厂大模大样地开下去，誰知麻雀吃糞糠——一場空欢喜。老华在监牢里坚持說理斗争，全市絲織业工人也起

来向警察局提出抗議。警察局怕事情鬧大，只好释放了华根和。特別使老刮皮头疼的，是那些原来受騙給他做夜活的工人，經過我們的教育，也不肯再替他干了。他找不到工人做活，一停就是一年零两个月，机子上都生滿了黃橙橙的铁锈。到这时，老刮皮只好低头认輸，答应增加工資。一分錢工資的斗争就这样胜利結束了。

一分錢工資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压在我們头上的三座大山，和資本家的种种压榨，还是使我們透不过气来。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印花人造絲織物，在国际和我国市場上大量傾銷，挤掉了中国絲綢的銷路。特別是在敌伪統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殘中国絲織业，大量砍伐江南一帶的桑树，养蚕的少了，生絲原料大減，綢厂紛紛关闭。在国民党反动派时期，物价跑风，絲織业在涨风中更是风雨飄搖，走上了穷途末路。到解放前夕，苏州开动的机台数不过六百台，絲織工人只有一千五百多名，产量和品种更是少得可怜了。我們工人都过着“五荒六閑，七死八活”的生活（解放前，絲織业每逢夏历五、六月銷路呆滯时，老板停机关厂，要到八月才复工）。我妻子也是絲綢工人，可是长期失业在家。

吃过黃連才知道黃連苦，干过絲織这一行，才知道这一行是啥味道。因此，我那时常对妻子說：“将来孩子长大了，决不让她做这一行！”

万紫千红喜迎春

平地一声雷，苏州解放了。云散天青，劳动人民见了太阳。絲織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就拿我們振亚絲織厂來說，解放前經營了三十多年，織机不过七十多台，花色品种不过五六个。可是解放后，已經发展成拥有四百多台織机、二千多个职工的工厂，生产出二十多个花色品种。其中有花团錦簇的織錦緞，有精美絕倫的古香緞，有薄如蟬翼的双管綃，有鮮艳无比的銀凸綢和翠晶緞，还有富丽堂皇的織錦被面等等，真是万紫千红一片春色。这些产品，有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的已有几十年的声望，还有的是解放后的新产品，它們都被誉为苏州的“奇花异草”，在国际和国内市場上得到很高的评价和荣誉。

随着生产的发展，許多在旧社会失业的絲織工人，解放后紛紛就了业。我不但有了工作，就是我那解放前失业十多年的妻子，也进了振亚厂做工。我們工作有保障，生活安定，再不为吃穿二字担忧了。最使我激动的是，我們这些在旧社会被人踩在脚下的“机叫花”，現在成了国家的主人，我在一九五二年光荣地参加了党。我們絲織这一行，不再被人瞧不起了，它是社会主义建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真是我祖祖輩輩做梦也沒有想到的。是党，給我們这一行带来了光明的前途，是党，給我的家史

上展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以做一个丝织工人为荣。一九五八年，当丝织业需要招收徒工时，我那初中刚毕业的大女儿也进了丝织厂。这样，从我祖父到我女儿，已是四代织绸了。

每当我看到一匹匹五彩缤纷、鲜艳夺目的绸缎出厂时，我心里总是充满着无比的自豪感，我们为祖国建设和荣誉贡献了力量！

我的三十年

福州火柴厂 郭可銀

徒工生活 牛馬不如

我家原住福州市郊郭宅乡，祖父和父亲因为在农村受尽压迫剝削，生活过不下去了，就跑到城里托人介绍进了火柴厂做工。

一九三四年，我十三岁时，家里央人讲情也把我送到建华火柴厂当了学徒。进厂的头一天，大主管先对我宣布了一套“厂規”，接下去又说：“要当学徒可以，不过你要听清楚：学艺的五年期间，老板说过，工錢分文不给，干活要老老实实，要是偷懶耍滑头，可别怪老子无情！”

悲惨的学徒生活开始了。每天清早五点钟，学徒的就要上工，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要干十三、四个钟头，累得全身骨头都象散了架似的。工厂的设备非常恶劣，工場就象猪舍一样，都是用木板胡乱釘起来的，又髒又悶，又低又暗，伸手就可以摸着屋頂，真是“夏天是蒸籠，冬天是冰窟”。劳动保护根本談不上，工伤事故成了家常便飯。工人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服，只是用一块破麻袋当围

裙。有一天，工人林德安的孙女刚上完夜班，一連干了十几个钟头，又餓又乏，狠心的資本家却硬逼着她再干日班。她由于过度疲劳，实在支撑不住，一不小心，麻袋围裙被机器咬住，整个人被卷了进去，机器立时染滿鮮血。等到大伙把她救下来送医院时，在半路上就死了。成品車間的劳动条件更差，車間里沒有一块铁，从运火柴枝一直到打篾、包装等八、九道工序，全部是手工操作。我打篾繞着工作台轉，一天要轉上三百多圈，就象驴馬拉着石磨团团轉一样，头都轉暈了，手脚还經常被竹篾割得皮破血流。

生离死別 家破人亡

一九三七年，資本家看我祖父已是年迈体衰，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就把他撵了出来。祖父失业以后，到处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家里生悶气。祖母、母亲做的竹器沒有銷路，也停了下来。我和父亲虽然在厂里做工，可是資本家拖着不发工錢，因此，家里常常断炊。为了一家人糊口，母亲含着泪，忍痛把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卖掉。殘忍的伪保长連人家卖孩子的錢，也要从中勒索，以致所剩无几，很快就用光了。生活仍然沒出路，母亲只好扛着鋤头，到乡下去拣人家挖剩的番薯、挖野菜。一天，母亲拾了一小籃碎番薯和野菜，拖着疲憊的身子从乡下回来，刚一进屋，我的父亲就悲痛地說：“孩子他媽，我对不起你，昨天

我把娣娣也卖到永泰去了，……”娣娣是我的大妹妹，那时已经十二岁了，母亲听到这里，顿时哭得晕了过去。接连从她身上割去了两块肉，做母亲的怎么不心疼啊！

祸不单行，旧社会工人家里的灾难，一个跟着一个。我的叔父被抓去当壮丁了，不久祖父又饿死了，老祖母过分伤心，哭得两眼也失明了。我的姑母闻讯赶来，带来她仅有的几块钱，买了几片木板，自己钉个木匣，草草把祖父掩埋了。

我和父亲半饥半饱地为老板卖命，仍然顾不了家里，家庭的生活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经不起常年累月的折磨，终于病倒，因为没有钱请医生吃药，不几天，就死了。我的祖母自从祖父死后，哭坏了身体，接着也去世了。祖母、母亲死后，不说买棺材，就是几片木板也买不起了！父亲只好把家里的一些零星木板拼拼接接，钉成木槽，收葬了她們。死的死了，卖的卖了，抓的抓了，我的一家就这样家破人亡。

餓了工人 肥了老板

不久，日本鬼子占领了福州，建华火柴厂搬到南平。

在南平，我们工人受的苦难更加深重。大老板知道我们回不了福州，就想方设法，更加残酷地剥削工人。那时候，他实行了“定额制”，以米作工资。规定：男工每天打篾十三件，发糙米一斤十小两；女工装盒二十盘，发糙

米一斤四小两。沒有完成定額者，一粒米也不給。資本家发的“工資米”，霉烂不堪，吃下去就拉肚子，我們的身體越拖越坏了。狼心狗肺的資本家又进一步吮吸工人的膏血，用“罰工”和扣“工資米”的种种办法，来剝削工人。我們只要迟到几分钟，或是不小心踩破了地上一个火柴盒，就扣一天的粮食。不仅如此，还用“开除”来威胁我們。后来，甚至工資米一拖再拖，几个月都不发。有时发一点烂米，資本家豢养的那班监工，还从中舞弊，尅扣起一部分，去換粉干、魚肉，大吃大喝，根本不顧工人死活。

工人沒有粮食吃，只好利用工余時間上山挖竹筍、采土木耳来充饥。我們餓着肚子，每天还要干十几个钟头的活，不久，工人生病的很多。有打摆子的，有水肿的，有拉痢疾的……老板对生病的工人，不但不帮助治疗，还硬逼着帶病上班。那时，我打摆子很厉害，发冷时候还能勉强干活，发高烧的时候就无法支持了。可是老板管你能支持不能支持，要你上班你就得上班。老板豢养出来的一批狗腿子监工，为了討好主子，監視工人特別卖力。我病得不行，好几天定額沒有完成。和我一起干活的郑依指僥幸沒有生病，他很同情我，起早貪黑拚着命干，尽量多做几件，悄悄地拿給我，让我湊滿定額，能够領到一点臭米度日。可是，有一天被监工发现了。这个坏家伙如狼似虎地猛扑过来，揪住我的破麻袋衣，罵道：“你这小子好大胆，竟敢投机取巧！”說毕，用力把我一推，我差点栽倒下去。他又轉脸对郑依指說：“原来是你干的好事！好，

今天連你的工資糧也不發給，让你去喝西北風！”在旧社会，我們工人兄弟連讲一点階級友爱，也成了“罪过”啊！

学徒生活熬过去了，我出了师，学到了一手打篾的技术，心里真高兴啊！可是不久，我的心就冷了下来。这时，抗战已經胜利，建华火柴厂又迁回福州，老板实行按件发錢的办法，一件活发三分工錢，我每天干十三个钟头，能打篾十三件，算起来每月有十来块錢。可是，物价不断飞涨，十几块錢到了月尾往往买不了什么东西。有一个月，我把領来的工錢，买一条面粉袋和十五斤米糠，就双手空空了。想想看，每天要干十三个钟头的重活，不要說十五斤米糠，就是十五斤大米也不够一个月的口粮啊！为了生活，我只得利用休息时间，悄悄跑到外面挖野菜充饥。天天吞糠咽菜实在难吃，我就想了个办法：少买些米糠，加买点豆渣，把豆渣、米糠、野菜混和在一起，做成餅子，弄来两块磚头砌个土灶，上面放块铁板算是鍋，把做好的餅放在上面烤，烤一次吃两天。

肚子塞不飽，穿的就更不用提了。那时候，工人做不起衣服，夏天就光着上身，穿着一条短褲去上班。我的一条短褲，补了又破，破了又补，已經到了破烂不堪的地步。厂里女工又多，实在为难，我只好少买糠，挤一点錢去买条面粉袋，胡乱做一条短褲。可是到了冬天，短褲穿不得，光着上身更不行，我就披着麻袋上班。

大老板从工人身上榨取大量血汗，发家致富，成了福建有名的“火柴大王”，連浙江、江苏等地也有他的火柴厂

分厂。此外，他又在家乡买了四百多亩田，在南平、沙县、邵武、将乐等县买了大片大片的山林，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又在仓前山盖了一座极华丽的“公馆”，三妻四妾，终日在那里花天酒地，恣肆玩乐。他还勾结官府，掠夺民女，糟蹋女工。这个“火柴大王”的罪孽真是太多了。

打罵欺压 种种迫害

资本家欺压工人的办法什么都有，他规定每天下班或上厕所，只要离开车间一步，就要搜查，谁违抗了，就逃不了老板的文明棍和工头的皮鞭。有一回，我和郑天寿去解手，天寿没经搜查就出去了，工头一见马上追了上去，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就给他几鞭。我忍不住了，去拉了天寿一把，工头的皮鞭就落在我身上，打得我们两个头破血流。男工被搜被打，这是家常便饭。更苦的还是女工。女工同样要挨搜查，老板通过搜身，可以发现女工有无怀孕，一经发现怀孕，就被开除出去。好多怀孕女工逼得没有办法，都用布带束紧腹部，常常不幸引起流产。工人本身受到资本家的迫害，第二代在母亲的肚里也受资本家“搜身制”的摧残，这是何等的残酷！

火柴厂在南平的时候，附近有一个亭子，大家叫它“死人亭”。病重的工人不能再上班了，老板就叫狗腿子把他们扔到“死人亭”去。一天，阮原杭和王茂盛病得不能起床，老板就指使工头把他俩拖入“死人亭”。大家听

到这个消息，气得不得了，把他們两人抬回来，放点“干粮”和开水在床边給他們吃，我們又趕去上班。等我們下班回来一看，阮原杭和王茂盛已經断气了。那时候，在資本家的眼里，死一个工人就和死一只螞蟻一样，根本不放在心上。資本家說：“我有錢宁可塞城墙（用在官府上面），也不塞狗洞（指給工人）。”常常都是工人們东借西凑，替死去的伙伴料理后事。工人的仇恨，是多么深重啊！

工人們对資本家的这种虐待，沒有一个不是滿腔怒火的。資本家为了維持他的剝削地位，花錢买通官府来对付我們。記得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我看到工人兄弟实在太苦了，說了句“杀罪好过，餓罪难当”，不想传到老板耳朵里，第二天夜里十二点钟，就来了几个警察把我抓走了。整整关了三天三夜，不給我吃飯。我受了餓罪不算，还罰了我四百元印花錢才放出来。……

当家作主 坚持革命

一九四九年，福州解放了。我們工人由奴隶变成了主人，我們不再受資本家的压迫和剝削了。經過党的教育，工人們的階級觉悟不断提高，逐步明确了只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才有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于是大家都忘我劳动，积极向資本家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許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当了劳动模范。有一百多工人提拔为干部。我們厂还有十五个工人

当上省、市人民代表，省市政协、工会、妇联委员。这些都说明，在新社会我们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十多年来，我们厂新建、修缮了很多厂房。成品车间不再是过去那个又低又脏的工场，而是一座五倍于原来工场的崭新砖瓦房。厂房宽敞、明亮，还装有电风扇。生产上实现了半机械化，劳动强度减低，生产率大大提高。从前，我每天干十三个钟头才打箕十三件；现在每天干八小时我能打箕一百二十八件。党一面在政治思想上帮助我们工人提高觉悟，另一面在物质福利上生活上也十分关怀我们。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工人有自己的宿舍、食堂、托儿所、俱乐部、医疗室，还办了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为工人读书识字创造条件。

我家也和所有的工人一样，生活得很幸福。我的父亲现已退休养老。我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都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一九五六年以后又一直是福州市工业劳动模范。现在我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成品车间主任。党的信任和关怀，鼓舞我更好地工作。

今天，我们有了这一切，是党给我们带来的，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经过了几十年的流血斗争得来的。这是多么不容易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仍然存在，国内的阶级敌人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还在继续。我是一个工人，一个共产党员，我一定更加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到底。

陶瓷工人的仇恨

河南省禹县城西三十公里，禹县、临汝、郟县交界处，有一座七华里长，被大柳、凤翅两山环绕的集镇，这就是有八百年悠久历史、以盛产陶瓷器闻名全国的神垕镇。镇内烟囱林立，瓷窑密布；运瓷器、进原料的汽车、马车、架子车，和购盆买碗的人们车水马龙；各种机器日夜转动，夜间灯火辉煌，犹如白昼……。这一切把神垕装饰得更加美丽、活跃、壮观，到处呈现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气勃勃、万物更新的繁盛景象。但是这一切又是来得多么不易呀！解放前神垕的陶瓷业长期被资本家、商会、商团统治着，那时的惨状和现在的情景，恰是一幅鲜明的对照。

解放前，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府，为了压榨工人、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在神垕建立了商务会，附设有武装组织——商团，专门镇压工人。他们打着保护工商业和地方治安的幌子，订立了许多统治工人的条款。只许资本家淡季停工、歇业、降低工资，不许工人在旺季涨工资、跳班罢工；只许资本家任意摆布、压榨工人，不许工人提合理要求。神垕陶瓷资本家流行着四停工，即：下雨停

工、下雪停工、工人要求漲工資停工、貨遲停工。可是陶堯工人却為要求提高工資不知坐了多少監牢，挨了多少打罵，犧牲了多少階級兄弟。工人張學理等為要求增加工資，被商團嚴刑拷打，長期監禁。反動政府為了鎮壓工人的鬥爭火焰，將張學理插上亡命旗，綁赴刑場準備槍決。但在全鎮二千多工人的鬥爭和壓力下，只得被迫釋放了他們。張學理因身體被嚴重摧殘，出獄不久就死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禹縣秋季遭了旱災，物價暴漲，工人生活無着。“仁和義”一個窑的三十多個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資本家常老六將窑封閉半年之久，不讓工人上工，還給他們加上調皮搗蛋、圖謀不軌的罪名，上報商會。於是，商團出動了許多人，對工人進行毆打鎮壓。裝窑工人老溫，被拉到商會，會長指使狗腿子：“只管打，打死了活該。”老溫被打的皮開肉綻，死去活來。老溫七十多歲的老母，因疼子心切，遂得病在床，連氣帶餓不幾天就死了。

由於商會、商團對資本家百依百順，畢恭畢敬，資本家也就更加無所不為，任意擺布工人，用各式各樣辦法壓榨工人。除四停工外，對工人又採取三“雇用”，即：貨快時雇用、丰收年景雇用、技術高的雇用。五個“一脚踢”，即：老了一腳踢、病了一腳踢、傷殘一脚踢、貨足一脚踢、荒亂年景一脚踢。

資本家為了把技術高的工人長期控制起來，達到更多地榨取工人血汗的目的，他們又採取預付定錢的辦法，

叫做付“压头”。工人拿了“压头”，就像拴上了一条无形的鎖鏈，一生一世都得給这个資本家拼命卖力。

在物价不断上涨，货币贬值的时候，資本家又有他剝削的新花样。他們以关心、照顾工人的名义，把大量紙币分发給工人，有发一年的，有发两年的，还有发三年、十年的。名义上是未干活先发錢，实际上工人拿到几年身价后，在几个月內物价暴涨，一年的身价只能买几斤玉米。

工人朱怀玉在“大德通”窑做工几十年，后年迈力衰，并患了职业病。資本家不但不給治病，不管飯，反而把朱怀玉一脚踢出窑場。朱怀玉无力走动，狗腿子就把他拉到炉渣堆上。資本家看了，还恶狠狠地罵道：“我养活了你这个癩蛤蟆一辈子，临死你还不离我这个窑。”朱怀玉就这样連气帶冻，三天沒有飯吃，死在炉渣堆上。狠心的資本家連死者的尸体也不肯埋，竟让狗腿子把死尸拉到沟里，让狗吃狼啃。等到朱怀玉的儿子来看他爹时，尸体已被狗啃得面目难辨了。

陶瓷工人王金，从小就学会做碗，当时是神屋陶瓷行业里首屈一指的技术能手。“予庆公”瓷窑的資本家为了从王金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潤，采取付“压头”的办法，把王金拉到他的窑上干活。到王金五十岁的时候，家中吃穿皆无，去找資本家借錢。經理說：“錢倒是有，就是你老了，你的孩子技术也不高，不能借給你。”王金走投无路，恶气难平，憤而跳烟囱自杀，尸体烧成灰烬。

神堂陶瓷工人王彥，也是有名的万能技术工人，資本家常老六为了从他身上謀利，就百般地拉攏他，逢年过节还請王彥吃飯，王彥在資本家这一套拉攏下，不明真相，干活很卖力气。他为常老六改进了产品品种，大做热貨，使常家取得了高額利潤，榨得了不少油水。到了二十年以后，年近六十岁的王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技术也一天天不听使喚。資本家看在他身上获利的时期已过，就在这年腊月三十，又請王彥来吃飯，在宴席上，下了“逐客令”。常家父子装着关怀的口气說：“王伙計，你年紀已老，也干不动活了，劳累了一輩子，也該享两天清福啦！我現在看着老伙計干活，真是有点心酸。你回家后，缺吃少穿还来找我。”哪知一出門，資本家就变了狗脸，根本不承认这壶酒錢。

轉年到了春季，恰是历史上最严重的荒年，少吃无穿的人們哭声四野，哀叫連天，飢餓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二十二岁的青年工人張寅，被資本家解雇，生活无着，活活餓死。年迈体衰的老工人王彥，更难抗住如此严重的灾荒。全家四口，餓死了三口，只剩下一个五岁的孩子，至今沒有音信。

工人張坡的父亲使了資本家二年身价做“压头”，几个月后，物价象飞馬上山一样，鈔票越来越不頂事，两年的身价只买了三十斤黑豆。結果，天天干活，却没有飯吃。在这年春荒时，張坡的父亲也被活活餓死，临死还未还完資本家的两年身价。資本家觉得“吃了亏”，就勾結

商团，把张坡的母亲卖到嵩县。搞得一家人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帮助张坡找到了母亲，使他們母子团聚。

工人干活的工資，是資本家根据自己的利益規定的。从身价中，資本家吸吮了工人的大量血汗，他們有时候付錢，有时候付粮，付什么对他們有利就付什么。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的三年間，禹县連續遭受水、旱、蝗、湯（指大战犯湯恩伯）四大灾，顆粒未收，物价飞涨。于是，資本家将原来每个工发六斤麦子的工資，改为发錢。加上七折八扣，直到月底才发到工人手里，結果每个工只合十二两麸子。資本家常老六却大囤圈着麦子、谷子、豆子、大米……，大車小辆地运往集市高价出售。工人拿到几个錢到集上买粮时，粮价又已涨了几十倍。后来因为灾荒日趋严重，資本家认为无利可图，就停工不干。絕大部分工人逃荒要飯，卖儿卖女，到处躺着工人和家属的尸体。当时商会会长瓷窑的十九个工人中，全家因饥饿死絕的四戶，餓死人的三戶，卖儿女、老婆和逃荒在外的七戶，这三种人占全窑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而資本家却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把剩下的飯倒給猪吃也不让工人吃，还指着工人，咬牙切齿地說：“你們这些人，只能餓死。”

到資本家认为存款比存粮有利的时候，他們就会把工資由发錢改为发粮。致使工人成年累月的干活，連买盐的錢都沒有。更可恨的是，資本家用十一升的大斗买进粮食，又以九升的小斗付給工人。

被剝削、被压迫的工人，是多么盼望太阳早些出来呵！

一九四七年冬天，神垕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建立了国营瓷厂。罪大恶极的商会、商团人员和资本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老工人说：“新旧社会对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我们永远忘不了对旧社会的仇恨，永远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党走。”

河南禹县神垕瓷厂编写

童工血泪

上海公私合营永福源鍍鏈厂厂长 施燦荣

解放前，在上海西康路上的菜市弄里，有片不大的永福源五金厂。这厂是怎样起家的呢？那是一九四〇年，民通紗厂有个叫周錫生的“領班”，原先是个地主，他凑了四千块钱，和另外两个人合伙，在菜市弄里租了一間不滿三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雇了两个老工人和三四个童工，买了点原料，敲敲打打，弄起了这厂专做表带、拉鏈、铁鎖的小作場。后来，周錫生来了个“大魚吃小魚”，把另外两个人的資金并掉，成为他一人独資經營的企业。他把在紗厂做“拿摩溫”的老婆沈杏娣也叫了回来，做了监工头。到上海解放，这厂永福源五金厂的财产可真不小啊！光是机器設備，就有电动車床、冲床、刨床、钻床三十多台，扩建的厂房有六百多平方米，雇用了一百五十个工人。至于原料么，周錫生一下子就能买进二十五吨銅皮，折合現在的金額，价值二十多万！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只不过短短十个年头，周錫生怎么会发得这样快呢？是不是他技术高明，或有什么創造发明所以发了大財呢？不是的。对他來說，五金行业完全是个外行，他和老婆又从

来不参加劳动。和世界上所有的资本家一样，他完完全全是吃了工人的肉，吸了工人的血，才肥饱了他自己。我过去是这个厂里的童工，亲身遭受过周錫生、沈杏娣的残酷剝削和压榨，自然成了这厂如何从一家破破烂烂的小作場，发展成为一片具有相当規模的五金厂的見证人。

靠包身工起家

资本家最殘酷的剝削手段，莫过于压榨包身童工的无偿劳动力了。周錫生和沈杏娣在这方面是相当突出的。解放前夕，这个厂有一百五十个工人，这里面，包身童工就有一百二十七名。这些童工是怎样来的呢？资本家周錫生、沈杏娣从开厂那天起，为了从童工身上可以长期掠夺廉价的劳动力，他們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乡下的亲戚朋友，专门招收孤儿。例如周錫生有个在无錫乡下教书的妹妹，她碰到学生当中有人不幸死了爹娘，就乘机說：“啊呀！小孩子死了爹娘，怪可怜的。我哥哥在上海开工厂，我介紹你們去做外国銅匠，学点手艺，要比乡下好得多了！”一九四三年，这个人用这种欺騙手段，一次就騙了七名童工到厂里来。童工进了工厂以后，老板娘沈杏娣就領他們到楼上佛堂間里，凶神恶煞似地宣布說：“你們都是十五岁以下的童工，家中无法生活，到了这里，要服从厂里的一切規矩。我是你們的大人，你們要听我的話，不准回家。要是誰走了，我要找介紹人賠償三年半飯錢！”

每个童工进厂，都得在一张卖身文契——关书上按手印。这张文契上讲明死了与厂无关、一切绝对服从厂主等语。凭了这一张“关书”，童工们就成为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奴隶了。

延长工时 强化劳动

资本家招罗了大批童工以后，首先是延长工时，残酷剥削压榨我们。那时厂里规定，凡是童工，一律从早上四点多钟开工，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歇工，实足足要做十九个小时。老板娘是厂里的监工头，她把纱厂里“拿摩温”对付工人的一套办法，搬到厂里来变本加厉地对付我们这些童工。天还没亮，老板娘就起床了，她一手拿了香，走进佛堂，打开收音机喇叭，同时高声地念“阿弥陀佛”，故意吵得童工睡不着觉。之后，她一手拿着佛珠，一手拿了鸡毛掸子，走到童工睡的统铺旁边，掀起被头，啪啪啪地按着次序打下去，嘴里高声喊道：“小鬼，起来了！太阳爬上屁股了！”“小死人，懒死人，快起来，再睡懒觉我要刮了！”就这样，童工们都被她逼起了床。脸都没洗，跑到机器旁边，就蓬、蓬、蓬地踏起来了。吃过中饭，老板娘睡觉了，童工们就在机器旁边吃饭，放下碗，又上工了。到了夜里，童工们已踏了十几个小时冲床，早已提不起脚，伸不动手，挺不起腰，筋疲力尽了。这时候，老板娘却精神十足地来监工了。要是谁打瞌睡，她就拿了鸡毛掸子往

誰头上抽。碰到誰完不成老板規定的“指标”，就是夜里睡到床上，老板娘也要把你拖起来毒打一頓，还要逼着你去完成“任务”。这样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一九四六年夏天，厂里有个童工名叫丁林富，他做的是第一道工序——表带扳模，一种坦克式手表带上的零件。因为鋼皮很薄，生活难做，沒有办法完成。老板眼看他完不成指标，第二天生产要脱节了，就把丁林富从床上拉起来，破口大罵：“小赤佬，你倒定心睡觉了，这是你存心捣蛋！”老板一面罵，一面就随手抽过一根皮带，猛力地往他背上抽打。那时丁林富上身赤膊，下身穿条破烂的短褲，被这只豺狼打得渾身是一条条血痕。站在旁边的老板娘，見老板打乏了，就变做一只笑面虎，拉住老板手里的皮带，笑嘻嘻地說：“林富，赶快去做吧！識相点，打你也是为你好啊！再不做天要亮了，明早生产接不上，你可要更倒霉了。”老板娘拉着丁林富走到工作台边，又矮又小的丁林富流着泪，縮着身子，在阴暗的灯光下，又蓬蓬蓬地干了起来。老板說：“明天下班前，你不做好一万四千节表带零件，我要你的狗命！”夜，很深了。童工們躺在床上，車間里一陣陣沉重的撞击声，象千万个錘头打在我們心上，我們怎么睡得着呢？丁林富一直沒有离开机器，从半夜直干到第二天深夜。

一九四八年夏天，老板接到一批铁鎖生意，利潤很高，数目又大。他估計不能按时交貨，就强迫童工拚命劳动。厂里有个十四岁的童工名叫张淡昌，老板規定他一

个人繞铁鎖弹簧，供应其他十几个童工。张淡昌拚命地做也来不及。有一天，老板娘眼看生产要脱节，就拉着张淡昌的耳朵，把他拖进佛堂間，逼他跪在菩薩面前。她举起一根鸡毛掸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夹头夹脑地向他打去，还高声地罵：“小赤佬，你就是偷懶，这批生活做不出，要你的命，让菩薩来处罰你，叫你不得好死！”她一边說，一边揮着鸡毛掸帚，狠狠地抽打他。頃刻間，这个赤膊的童工，肩上、背上、脸上爆起了无数条血痕，疼得他渾身痙攣，嚎啕大哭。他的手被老板娘打肿了，还被逼到車間里繞弹簧。这时，正巧张淡昌的娘从乡下赶来探望他，一进門看他面黃肌瘦，滿身血痕，抱着他就哭，又低声地問他：“怎么啦，你身上弄成这个样子？”张淡昌含着泪，看了看他娘，又看了看瞪着眼站在一边的老板娘，抽噎地指着身上的血痕說：“媽媽，我发痧了，这是刮的痧筋！”

用笨重的机器来吸尽工人的血

資本家的財富一天天增多了，工人中的工伤事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惨重了！

一九四八年，永福源五金厂已发展得具有相当規模了，厂房、机器、工人，都大大扩展和增加了。可是，由于老板只知发财，工人劳动条件极端恶劣，所以在一百五十个工人中，被机器軋断手指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被机器炸瞎眼睛的有一人，有两个童工因工伤而死亡。有个十

五岁的童工名叫王才寅，工人都叫他“长脚小江阴”。有一次，他的两只手指被机器轧断了，可是骨头还没断，老板娘就逼着他用剪刀把手骨剪断。又逼他一手吊在颈里，一手劳动，以致疼得他昏倒在车间里。童工们把他扛到阁楼上，他不吃不喝，睡了三天，也没有医治，结果死在阁楼上。他死后，老板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巧门口有部垃圾车经过，老板娘就把他摔进了垃圾车。

老板对待他的亲戚同样不讲什么“人情”，那种残忍的手段，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资本家的冷酷无情！记得是一九四五年，老板有个外甥，名叫繆福炳，住在江阴乡下。繆福炳五岁、七岁时死了爹娘，留下兄弟四个，在乡下艰苦度日。到繆福炳十四岁时，老板觉得机会来了，就到乡下去伪装慈悲地对孩子说：“你们都是我的内侄，既然爹娘死了，还有我这个姨父在，就跟我到上海去吧，四个人通通到我家吃饭，我供养你们读书！”孩子听了，觉得有这样的姨父，当然高兴，就跟他来到了上海。可是，一到上海，这四个外甥就成了他的童工，同样受尽他的残酷剥削和折磨。有一天，繆福炳十岁的弟弟繆福兴的手指被冲床轧断了，可是骨头还没全断。老板娘就拉着他耳朵，走进佛堂间里，拿了剪刀，对福兴说：“外甥啊！你怎么这样不小心，连手指都轧了？哈哈，轧了也好，到五金厂来当学徒，不轧脱手指是不能满师的，这是做老师傅的记号。来来来，我给你用剪刀修修齐！”话音刚落，老板娘就目光狰狞，一手捏住繆福兴那只鲜血淋漓的手，一手拿了一把又

锈又钝的剪刀，“咔嚓”一声，剪到未断的骨头上。可是剪刀钝，剪刀口轧住了福兴的手指骨，疼得他满头大汗，呼喊救命。老板娘不闻不问，又咬着牙齿猛力剪了三下，可是骨头还剪不断。她灵机一动，对站在一边的女儿说：“把車間里的大剪刀拿来！”大剪刀拿来了，老板娘脸上露着奸笑，在佛坛前对满头大汗、面无人色的福兴说：“外甥啊！你不要看，熬点疼，剪掉了，让菩薩保佑你！”说着，一手指指女儿，要她捉牢福兴，一手拿着大剪刀，“咔嚓”一声，把手指骨剪断了。她随手从香炉里抓了把香灰，塞在鲜血淋漓的手指上，又敷了点車油，弄了块破布包上。随后摸出几个錢币往地上一摔，皮笑肉不笑地说：“好了！小赤佬，买根油条去补补血吧！”

黃連樹下的童工生活

童工，非但在一天二十小时內，被資本家任意剝削和摧殘，就是在二十小时以外，也同样受尽折磨。在永福源厂的三层楼里，再用木板吊起四层小鴿棚，这就是童工的“宿舍”。人們都叫它“七重天”。这小鴿棚，每一层只不过一米高，有十五平方米，要睡十五个人。而这种“七重天”的地鋪，还是年紀較大的童工才能“享受”的。那时全厂一百五十名工人，睡进“七重天”的只有六十名，还有九十名小童工，夜里沒处安身。冬天，他們縮着身子，盖着麻袋、废回絲，挤在水泥地上的冲床底下。夏天，“七重天”

上热得象蒸籠一样，爬到里面，象进了火海，根本没法睡觉。童工們只有成群結队到小菜場去过夜。可是，从厂里十一二点钟下工，睡到夜里三四点钟，菜場要上市了，他們只得睡在馬路上。这真是人間地獄，我們永世难忘！老板为什么要搭这“七重天”呢？道理很簡單，他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在工人身上多花一分錢，他是不干的。举个例子來說吧，那时候，“七重天”里装的电綫都是些废旧电綫，要是稍不小心，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險。有一天，有两个童工黑夜爬进去睡觉，忽然間，肩膀被天花板上的电綫吸住了，全身麻木，幸亏爆断了保險絲，这两个童工的生命才未断送。

晚上沒处睡觉，对童工來說，还算不上是最大的苦难。老板更毒辣的手段，就是他为了賺更多的錢，长期不給童工吃飽肚子。我們每天为老板做近二十个小时的牛馬活，可是吃的是什么东西呢？烧早粥的时候，老板娘站在旁边看着，烧得稠了，老板娘不但要打罵，而且要放进冷水，使粥由稠变稀。八个童工只有一小桶薄粥，吃完了就不能再添。誰吃得慢，誰就餓半天肚子。即使吃得很快的人，肚子也同样挨餓。因为那种稀飯，稀得可以照見人影，如果把飯勺用力放进粥桶，粥濺起来可以濺到楼板頂上。我們每天的“小菜”，常常是八个人一撮盐，用筷子沾沾，有点盐味就算了。到了夏天，老板娘就叫我們到垃圾箱里去拾西瓜皮，切成小块，放上盐当菜吃。按照老板的說法，这是他們乡下的“名菜”，“吃了不会生病！”这样还

不算,更加毒辣的是,夏天早晨,老板娘故意多烧稀飯,每一頓,总要多烧七八小木桶,放在老板娘房里。等到中午,稀飯发酸了,她才拿出来給我們吃。这样,就可以使童工們少吃或者不吃。这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資本家的毒蛇心腸!由于老板这样折磨,童工常常得病。有一次,童工們拿了发馊的稀飯吃不下去,老板娘就强迫我們吃。她見旁边一个童工不吃,就說:“为什么不吃?”伸出手掌,啪、啪打了他两个耳光,又大吵大叫,象个女流氓似的罵开了。

有一次,刚吃过早飯,有个十六岁的童工陈兆祥,因为肚子沒有吃飽,拿了飯碗走进老板娘房間去盛粥,說:“我还没吃飽!”老板娘見了他笑笑,随手捧着一鋼精鍋又干又白的稀飯,对兆祥說:“来,小赤佬,沒有吃飽我端給你吃!”她說着就跑下楼来,在車間里当着許多童工,盛了滿滿的一碗,放在陈兆祥面前,叫他吃。她一手捧着鍋,一手高举着飯勺,看陈兆祥吃完,就又給他盛滿,二碗、三碗、四碗、五碗……一直吃到十多碗。陈兆祥实在吃不下了,老板娘却硬是逼着他把滿滿的一鋼精鍋子粥吃完。粥是吃完了,可是陈兆祥脹着肚子怎么也爬不起身。这时候,老板娘就逼他劳动,还狠狠地罵:“你吃倒会吃,做倒做不动!”說着又拼命地打了他一頓。从这一件事后,童工們即使身子餓得发抖,再也不敢說个“餓”字。但从早上四点钟起,我們要劳动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又沒有吃飽,怎么行呢?有一次,有个童工叫王友富,在夜里十二

点钟，摸到老板娘房里去偷偷盛了碗粥，给她发现了。老板娘拉着他打了两个耳光，又叫来了女儿，把王友富绑在工場間的长凳上。她拿着粗棒，猛力往他身上打。这还不算，她还走到“七重天”，叫醒每个童工，叫我們排着队，每人轮流用木棍重打三下！我們睜着憤怒的眼睛，誰也沒有打。老板娘看童工們都不动手，她举起木棍高声地喊：“你們要造反了！”把我們乱打了一陣，大家跑散了。从此以后，再也沒有人敢到老板娘房間去盛粥了。为了吃飽，童工們夜里下工，每人都到菜場里去拾菜皮，拾来后放在一只小罐头筒里，到隔壁翻砂厂的火炉上烧熟了吃，作为一頓“夜点”。

黃連樹下的童工生活，比黃連还苦。长年累月，沒有工資，沒有开水喝，沒有毛巾洗脸，沒有衣服穿，沒有廁所，凡是一个人最起碼的生活权利，全都被老板剝夺了！那时候，我們許多人是用麻袋遮身的，夏天睡馬路，冬天就睡在廢旧回絲堆里。我們几个月不洗一次臉，身上老白虱多得可以随手抓。那个时候，老板規定每半个月有一个“休息夜”。所謂休息夜，就是到了該休息的这一天，从早上四点钟开工到夜里七点钟歇工。歇工后，老板娘監視着我們大扫除，把車間里所有的垃圾扫干净，然后，逼着童工們从垃圾堆里拣銅屑，拣完了，已經九点钟敲过，要是想去洗个浴，浴室已快放水打烊了。第二天早上，又是四点钟开工！这就是“休息夜”。那时候，不管天冷天热，厂里不供应开水，童工劳动得气喘嘴干了，只好

偷偷地到小菜場井边去喝冷水。早晨，大伙都不洗脸，每个人的脸孔，黑得像鍋底一样。有一次，有个童工弄了只小铁罐，晚上下工时，放进冷水煮在火炉上烤，准备洗洗身。誰知道开水炸掉了盖子，把他脸上烫得全是水泡。至于工資，那就更不用說了，老板每月只发給我們刚够剃一次头的月規錢。可是童工們的头发老长，脸又黑古矐冬，所以剃头师傅也不乐意給我們剃，要剃就得多給一些錢。有一次，有个童工到理发店去理个发，結果头是剃了，可一个月的月規錢付理发費还不够，被理发工人跟到厂里来要錢。

我們童工，就是这样蓬头垢面，身上无衣，挨冻受餓地度过漫长的学徒生活的。

伟大的毛主席給了我們新生

上海解放了，我們得到了新生。一九五一年，市总工会特別关心这个童工厂，专门派工作组下厂来整頓了工会。这个工厂，是全上海第一批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工厂之一。解放前在这里得了肺病的三十多个工人，得到了医疗，有的还进了工人疗养院。全厂工人的工資进行了合理調整，平均工資达到了七十元。领导上还拆除了“七重天”，新造了工人宿舍，原来睡地鋪的，都睡上了木床，不少工人还搬进了新村。一九五三年开始，全厂机器設備全面进行了改革，逐步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每台

机器都装上了安全防护设备。工人只要站在机器旁边，注意它运转就行了。我们这批解放前的童工，绝大多数都支援外地，参加祖国建设。留在厂里的，有的人当了技术员，当了干部，还有些同志参加了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要是没有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这批奴隶，不知要被吃人的资本家摧残到何等地步啊！

沈 霞整理

难忘的仇恨

湖南漣源鋼鐵廠老工人 陳福生口述
龔道鈞整理

資本家毒設牢籠計 窮工友被迫當牛馬

我老家原住在湖南湘鄉田家沖。舊社會，家里窮，地主逼得又狠，無奈，全家飄泊到湘潭。

到湘潭後，我和街鄰羅四伯到李興記翻砂廠當普工。那家翻砂廠在河東扁担街，當時是湘潭的一家大翻砂廠，雇着七十多個工人。老板李永松有四十歲年紀，瘦長個子，一張干癟的臉上鑲着一對滾圓的眼睛，人們都叫他“李猴子”。他什麼花招都耍得出來，比狼心還毒。他有個堂侄，名叫李桂芝，是劉家灣的偽保長，和他的象貌相似，也是個十惡不赦的傢伙。這一對凶狠，不知吸吮了多少人的血汗，殘害了多少人的性命。

一九三八年，我進廠後的第四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偽保長李桂芝帶着鄉丁挨家挨戶抓壯丁。劉家灣一帶也被弄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青壯年只好到處逃避。我們窮工人再也不敢回家了，露頭就有被抓去當壯丁的危險。

哪知躲过这一灾，又有另一难。事过一个月，老板发工钱了，谁知给我们的不是光洋，都是一色的“法币”。我顿时一惊，老板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钱呢？这种票子常“跌水”，隔夜一块钱就要贬值许多。我和一伙工友一齐跑去找李老板，大伙儿围着他說：“我们讲的都是銀洋，这种钱我们不要。”半天，李老板才从虎皮躺椅上坐起来，扫了我们一眼，奸笑道：“哈哈……弟兄們要銀洋嘛，这个实在难办，时局一紧，銀洋都入了庫，只有法币流通，我姓李的不是故意亏待你們囉！”打这以后，每个月发工钱都是以二十块銀洋折成四十块法币計算的，四十块法币在市場上只能兌回八块銀洋。后来我发现老板进货銷貨都是用的銀洋，为什么给我们的工钱又是法币呢？原来老板用銀洋到市場上去兌換法币，一块銀洋換五块法币；而折給工人，却一块銀洋只給两块法币，他从中賺了一倍多。

我把这事告诉了罗四伯。他气愤地說：“这家伙恶毒得很，明明是剋扣我們的工价，还說沒亏待我們。我看，我們也让他伤点老本，做个他急我不急——磨洋工！”經過罗四伯一串通，工友們都暗暗地行动，鑄的“活”由每天五六炉（铁水）降低到四五炉了。李猴子見苗头不对，便整天跟着工人的屁股轉，想卡死我們。可是不管他怎样監視，产量依旧天天下降。李猴子見这一招不頂事，便施展了另一个阴谋手段。一天快下工的时候，李猴子来到工場，对我们說：“下工后，請大家到賬房里去結賬。”我不由得心里怀疑起来：还不到发工钱的时候，結什么賬呢？

挨到下工，大伙儿跑到賬房。这时李猴子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装着要哭的脸，见了我們便站起来，踱着方步子，一双手反剪到背后。他踱了几步才抬起头来说：“弟兄們，我的生意現在亏了大本，想暂时歇一歇，請諸位另行高就，日后倘有起发，再接諸位来帮忙。”不等我們回話，他又把眼睛向那个肥胖子管賬一瞥：“給他們結賬哇！”肥胖子打了一陣算盘，然后給了我們每个人二十块法币，我們这些穷苦工友就这样被解雇了。

我和一些工友刚回到刘家湾，伪保长李桂芝便坐到工友家里逼壮丁費，弄得我和罗四伯及其他工友都不敢回家。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們一伙穷工友一齐跑到李猴子家里要求复工。这时李猴子假惺惺地望着我們一笑：“我姓李的一貫是‘同舟共济’的，只要諸位包我的生意不亏本，我願和大家分一口飯吃，哈哈……”我們只好忍气吞声，又給他当牛当馬的干下去。

后来我們才知道这是李猴子事先設好的圈套，他假意关闭工厂，讓我們回家，却又暗中指使李桂芝到我們家中逼丁、逼費，使我們有翅难展，服服貼貼地給他当奴隶。

复工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和罗四伯正在打砂箱，突然一陣啼哭声掠过我的耳边。我掉头一看，是我的妻子哭啼啼跑进来喊道：“不得了啊！天呀！爹媽給狗日的保长逼死了……”妻子哭天喊地叫着，犹如一把鋼刀戳进了我的胸膛。我抓着一根铁棒就往外跑：“狗日的李桂芝，老子不宰了你就不做人……”工友們都跑来拉我，罗四伯

一把把我抱住：“福生，你不能这样！”

为詐財保长逞凶 遭毒打父母双亡

我怀着无比的悲痛往家里奔，罗四伯也陪着我回来了。还没进屋，只听见里面人声愤怒：“丧尽天良的王八蛋！这一家人都完啦！”我没命地跑进去，唉呀！妈妈的尸体躺在破板床上，瞎眼的爹爹倒在床边的地下，三岁的小妹崽在哇哇地哭。看到这惨状，我浑身的血都沸腾了，眼泪也没有了，转身跑到门角落里，拿了一把镰头朝门外面跑：“狗日的李桂芝，老子跟你拚了！”罗四伯泪汪汪地跑拢来，抢了镰头：“福生，你千万不能这样……你还有妻室儿女……”

“楚桥伢崽（我哥哥）拿着一把菜刀，跑出去一天了，还不知道闯了祸没有！”罗四伯的老伴插了一句。

“他到哪里去了？”罗四伯惊讶地问。

“他寻草药回来，见爹妈躺在血窝里，他的老病又发了，拿着一把菜刀就往外跑，我们娘们没把他拉住。”

这时我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一头倒在双亲的尸体旁，一声爹一声娘地痛哭起来，不久就昏了过去。

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死的呢？原来是李桂芝想在我們穷工友们身上大发横财，他向伪乡长献媚献策：凡是有人到工厂做工的，每户要派壮丁费二十块銀洋，他这个鬼主意正合伪乡长的心意，这就使得刘家湾的穷苦工友的家

屬們陷入了苦海深淵。

那天早晨，妻子正在燒火煮粥，李桂芝帶着三個鄉丁到我家裏來了，他神氣十足地向我媽媽掃了一眼：“陳大嫂子，奉上級命令，你們當工人的，每家要出二十塊銀洋的壯丁費，馬上要交！”我媽媽頓時被吓得傻了眼：“保……保長，你……你這是說哪裏話？”

李桂芝拉着瘦長臉，惡狠狠地說：“人家的崽替你們去當兵賣命，你們在家安穩，難道出一點錢都不應該嗎？”

我爹爹聽不下去了，怒不可遏地從床上爬起來說：“你不要我們活命哪！大崽成了殘廢，二崽給你叔叔當奴隸，我們哪來的錢？”

“哼！說得倒輕鬆，這是政府的規定，你胆敢違抗不成！”李桂芝一邊說一邊賊眉賊眼地搜尋着，走到灶旁邊揭開鍋蓋：“哈！還說沒有錢，吃的盡是白米……”說着他把眼睛向三個鄉狗子一瞟：“沒有錢交，把這鍋稀粥先拿走！”幾個鄉狗子伸手就來提粥鍋。我媽媽一氣之下竟昏倒了，爹爹雙目不見，只得亂撲一陣：“狗日的傢伙，這鍋稀粥，是你叔叔給我崽的半个月工錢換來的，你們這是殺人哪！”我爹拚着老命大聲喊着罵着。

“混賬，給我把他的兩床爛被子拿走，凍死這兩個老傢伙！”偽保長指使兩個鄉狗子就要擄被子，我爹爹一把抓住了一個抱被子的鄉狗子。那傢伙仗着保長的勢，一脚把我爹爹踢倒了。我爹滾了幾滾爬起來猛地撲過去，一

下正抓住伪保长的肩膀，他狠命地咬了一口，咬得那家伙一声尖叫，血水当即流了出来。乡狗子一看伤了他的上司，一枪托就把我爹爹打倒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竟被他们这一枪托送了命。妈妈气昏过去后，一直就没有苏醒过来，也与世长辞了。

资本家再贬工价 穷工友怒打把头

一九四四年，李兴记翻砂厂的生意，趁着国难日益兴盛起来。老板李猴子利用诱骗、讹诈的手段，又招来了五十多个从异乡逃来的难民，李猴子的侄儿李桂芝当了把头。

李桂芝是穷人的死对头，大家都咬牙切齿地痛恨他，恨不得把这个家伙扔到化铁炉里烧死。哎，那个年月是他们的天下，虽有刻骨仇恨也不能轻易下手啊！

李桂芝到了李兴记翻砂厂后，专干坏事。他为主子效劳真是腿勤眼勤。整天跟着我们的屁股转，一点也不放松，累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过去是白天开炉，李桂芝当了把头，把开炉的时间放在晚上。白天打箱、做杂工，延长了劳动时间，增加了劳动强度。

这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大妹崽六岁，小妹崽一岁。家住在翻砂厂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我每月的工钱，只能供他们糊半月的口。妻子没法生活，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去沿门乞讨。每当我深更半夜干完活回来，一岁的妹崽

总是餓得哇哇地哭，瘦弱的妻子沒有奶汁給孩子吃，孩子就这样餓死了。

好容易盼到发工錢了，李桂芝把我們刘家湾的十几个穷工友喊攏去。李猴子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捧着黃銅水烟袋在慢慢地抽着，見了我們，他干瘦的脸上現出了阴笑：“弟兄們，請坐！”我心里想：老板为什么单单喊我們刘家湾的十几个工友呢？这里面一定有蹊蹺。

“大家坐吧，都是乡亲，随便点嘛！”李猴子又客气地說。我滿肚子的气忍不住了，便問道：“有么子事？就請讲吧。”

“哦！莫慌嘛，哈哈……”李猴子打了几声哈哈，离开了太师椅，反剪着双手，弓着背，慢慢地踱着：“跟大家商量件事。說句知心話，时局不好，我的生意眼下又做不成了，想請弟兄們給我帮个忙，工錢的事，暂时减一点，日后生意兴旺，增补弟兄們的工錢。”他說到这里，把眼睛向李桂芝一瞟，把头会意地点了一下，走到賬房門口，恶声恶气地說：“給刘家湾的弟兄們提前发工錢呀！”那肥胖子管賬，打定算盘，仰着肥脑袋，头一声就叫着我的名字：“陈福生領工錢。”我走攏去接过錢来一数，只有三十块法币，顿时一惊：“怎么，一次减了十块？”肥胖子管賬皮笑肉不笑地說：“这就算不錯了，三十块錢可以雇两个难民咧，乖乖地拿去干活吧！”我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地收下了这点錢。

原来李桂芝已买通了难民收容所的負責人，大肆貶

低工价，榨取难民的血汗。他知道我們刘家湾的工友不好惹，就借口生意亏本来詐騙我們，并用难民的工价进行威胁，想叫我們服服貼貼地为他干下去。

時間又过去了三个月，端午节到了。这天大清早，李桂芝来到工房：“罗老馆子，我家老爷請你們刘家湾的工友打个‘牙祭’，下午来呀！”李桂芝洋洋自得地說完走了。罗四伯对我說：“看这家伙今天又使什么坏主意。”

下午，我們刘家湾的十几个工友一起来到李猴子家里。真闊气呀！堂屋里摆了两张八仙桌，滿桌菜肴，冒着香噴噴的热气。李猴子假惺惺地笑脸相迎，李桂芝在一旁滿口奉承：“我家老爷真是仁义道德，多够朋友，哈哈……来！自己人莫客气。”

我們散坐一旁。李猴子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口里衔着水烟袋慢慢地抽着。他吐了几口烟圈，望着我們癡笑了一下：“請諸位来，一則欢度佳节，二則也有个事和弟兄們商量商量。”他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弓着梳子背，慢慢踱到我們面前：“产品銷路不佳得很，哎！生意又亏了大本。工錢的事，还要請諸位让一点……。”我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便气冲冲地搶过来说：“你的生意亏什么本？上个月生产的袜机座，你就卖了五千块銀洋。这出戏不要唱了吧！”我这一頂，竟使李猴子张口結舌，恼羞成怒了：“你……你这是瞎說。”罗四伯也站起来补了一句：“那么多的袜机座到哪里去了？”大伙也跟着鬧了起来。李桂芝見真相毕露，便急忙帮腔說：“干不干由你們，

工錢還要減十塊。”

李猴子仍舊奸笑道：“還是好好地去做事吧，不是我這個老板，你們到哪里找得到一口飯吃嘍！”

我心里一想，再減就只剩下二十塊法幣了，還不夠她們母女十天的生活。我越想越傷心，看到李桂芝這個殺人不見血的家伙，舊仇新恨交織在一起，一股怒火從我的心底猛然涌上來：“李桂芝，老子不給你們當奴隸了。”我驀地站起來指着他的鼻子罵道。

“好哇！你倒有胆量，不識抬舉的東西，給我滾！”李桂芝沖着我吼道。

這時我憤怒地握緊了鐵一般的拳頭，猛地擊過去，一拳打掉了他的兩顆門牙。他滿口的血噴了出來，象一條惡狗一樣地猛跳着，吼叫着……。

李猴子也跟着跳了起來，要拿我去見官府。羅四伯見闖了大禍，慌忙和一伙工友一齊來解圍，我便趁機逃出了虎窩。

跑到家里已是掌燈時分，妻子見我這般情景，吓得驚叫起來：“哎呀！你這是怎麼啦？”

“趕快走啊！”我來不及細說，一邊喊着妻子，一邊卷着床上的一床爛被子。妹崽吓得哇哇地哭，妻子吓呆了，站在地上不動。我心想：偽鄉長是李桂芝的拜把兄弟，今晚不逃，明天就逃不脫了。便回頭拉着妻子說：“我闖了大禍，揍了狗日的李桂芝！”她一把抱着小妹崽，我背着一個大滾包，趁着茫茫黑夜逃出了家門。還沒走上半里路，

便听到背后犬声汪汪地吼叫，人声呐喊。我心里顿时一惊：“糟了，这一定是李桂芝领人来捉我们了。”我慌忙拉着妻子说：“她妈，我们赶快往背巷里躲。”

我们赶忙往一条窄巷里窜，三步两步穿过巷道，忽见拐弯处小茅棚里，射出一丝微弱的灯光。我们急忙奔到门口，从门缝往里一望，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坐在昏黄的油灯下面补衣服。我慌忙喊了一声：“老妈妈，请您开门。”这一喊把她吓了一跳，慌忙地抬起头。“老妈妈，救人啊！”妻子又喊了一声。她端着油灯摸到门边，把门闩拉开，我们慌慌张张地跨了进去：“老妈妈，请您救救我们，李桂芝带人来抓我们了。”

“哎！这是什么世道啊！”老妈妈惊慌地打量着我们，又扫了一眼窄小的房子：“来！你们赶快躲在我的床后面。”她把一张破柜子移开，我们从柜旁挤了过去躲在床后面。老妈妈又把柜子移回原地，熄了灯，睡在床上。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又听到砰砰砰的打门声。“老爷们，我这里没有什么呀！”隔壁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走！到隔壁茅棚里去。”我一听这正是李桂芝的声音，原来他们在挨门挨户地搜查，看来这家伙要下毒手了。

“开门！”砰砰砰……

老妈妈起床点亮了油灯，打开大门。一伙凶煞象潮水一般地涌了进来。妻子把妹崽抱在怀里侧卧在地上，我蹲在壁角，只隔一层蚊帐，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们。十几

个持枪的乡丁满屋里乱转。李桂芝拄着一根棍子，头上捆了一条白纱布，他用手捂着嘴，两只恶眼瞪着老妈妈，狠狠地說：“你家来了什么人沒有？”

“老爷，你这是从哪里說起？我是个孤老，独崽当壮丁死在外面了。”

其中一个乡狗子說：“老爷，我看莫耽误时间了，快去追吧！这一点小茅棚，藏不住人的。”“好哇！看你陈福生小子往哪里逃？让老子抓住不剥你皮抽你筋不为人也！”他把手中的棍子往空中一扬，对乡狗子命令道：“走！往北头巷口追！”

这群恶煞一阵风似地冲了出去。这时，我才松了口气。老妈妈走到門外面探望了一会儿，跑回来低声地喚我們：“他們往北走了，你們赶快逃吧。”我和妻子走了出来，拉着老妈妈的手說：“老妈妈，您貴姓？多亏您救了我們全家。”

“快走吧，孩子！我姓胡，都是穷苦人哪。”老妈妈眼泪汪汪地說。

我們告辞了这位老妈妈，往南头的巷口走去。这时已是过半夜了。我拉着妻子，跌跌撞撞地摸出湘潭，直奔荒郊。

一声春雷惊天地 共产党拯救穷苦人

我們从湘潭逃出，一直逃到衡阳，我在衡阳又找到了

一家翻砂厂做工。到这里还没有干上一年，因为我的脚给铁水烫伤，被资本家开除了。烫伤的脚没钱医治，伤处日益溃烂，眼看没有一条生路，只好沿门乞讨。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带着妻女逃回了湘潭郊区，仍旧讨饭度日。溃烂的脚，由于妻子想了些土办法才慢慢地治好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屋檐脚下安歇，睡到半夜时分，忽然听到屋后的大道上，响着整齐的脚步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我大吃一惊，便悄悄地摸到屋旁一棵大柳树下，借着朦朧的月色看过去。哎呀！是过兵！我不由得一阵心悸，暗想：这是解放军吗？哪里来的这样快？是蒋匪军吗？不对！那帮家伙没有这样严肃整齐。瞧，过这么多的兵连狗都不叫一声啊！我看着浩荡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如同神兵一般。这时皎洁的月亮正从云堆里钻了出来，照得林子外面一片明亮。我的眼睛豁然明朗了，清楚地看到他们帽沿上的五角星。“好呀！”我高兴得几乎喊了起来，但又怕惊动了队伍，竭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我悄悄地从树旁转了过来，飞也似地跑回屋檐脚下，情不自禁地推醒了妻子：“她妈，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妻子忽然惊醒，揉着眼睛坐起来，聆听了一下，说：“象是过兵？”

我说：“是的，解放军、共产党来拯救我们啦。”妻子顿时满脸笑开了花。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笑脸，这笑里流露着无限的景仰、期望和欢乐的心情。我也跟着笑了……

第二天清早，我們奔到湘潭街上，街道大变样啦！墙壁上都是貼的五顏六色的“欢迎解放軍”和“共产党万岁”的标語，滿街都是解放軍。他們个个精神振作，笑容可掬。欢迎解放軍的爆竹声、鑼鼓声、欢呼声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震撼着城市，震撼着原野。

一个星期后，市面上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們也被安置好了；我的妻子被安置在解放軍被服厂工作，还当上了居民委员会的組长咧！大妹崽上了学。我又回到了李兴記翻砂厂。这时老板表面上也改变了态度，可惜的是狗日的伪保长李桂芝，被我那一拳打了以后，不久便得病死了，这倒便宜了他。

一九五二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反对不法資本家的猖狂进攻。一天晚上，工作队的屈同志到了我的家里，亲切地給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打这以后，我漸漸地明白了过去受苦受难的根源。

我現在滿五十一岁了，人們都說我越活越年輕了。可不是嗎？我真的返老还童了！在大跃进中，我是全厂的先进生产者之一，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培养下，現在我成了七級技术工人了。我的大妹崽是师专毕业生，二伢崽讀到初中毕业，便参加了祖國的工业建設，还有一个細妹崽和一个伢崽也都上了学，一家人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我的这本辛酸史，除了自己永世不会忘記外，还常常讲給我的伢崽們听哩！記得今年在株洲工作的大妹崽，

暑假回家看望我，談起家常的時候，又扯到了過去。大妹
崽蹙着眉頭，有些厭煩地對我說：“爹，您又翻那本辛酸賬
了。”我說：“怎麼不翻呢？生活越好越要翻，你們青年人
就不知道生活是咋好起來的。”

黨拯救了我，拯救了我們一家，拯救了全中國所有的
勞苦人民。黨，是我們再生的爹娘，她給了我們無比的幸
福，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跟着毛主席走，為共產主義奮
鬥到底！

第一次拿工錢

浙江省黃岩縣路橋機械廠 戴開忠

今天，我們工人在自己的工廠里做工，不但能定期拿到工資，勞動得好還能拿到獎金；生了病還能得到免費醫療，工資按規定發給……這一切，在今天看來，也許是平平常常的事吧！但是只要比一比過去，就是一個天地變化！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在海門翻砂廠學徒三年期滿。媽媽東奔西走借了二石租谷，辦了“出師酒”，我总算出師了。老板酒足飯飽以後，咧着嘴向我媽媽“賀喜”，還說以後每月給我四斗半米的工錢。我听了真高興，心想：这下可熬出头啦！只要好好干，就会有办法……于是我牛馬般地干着活。一個月過去了，老板說工錢等到年關一起發，我也沒說二話，仍然起早摸黑地干，一心只盼着年關時拿到工錢，回家看看可憐的媽媽。

年關快到了。一天，我和師兄弟們蹲在地上吃早飯，大家說笑着，打鬧着，都很高興。因為就要拿到出師後的第一次工資了。誰知就在這個當兒，突然把一碗飯打翻了。老板一見舉起手杖就打。師弟被打倒在地上，還要

赶来打我。我气极了，忍不住说：“出师了，你还要打我！”

老板大喝一声：“哼！我不打你，你吃的饭是谁的？”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自己挣的！”

“自己挣的？”他大吼着，“你有本事，你给我滚！”

“滚！”我一怔：“好！你把钱算给我，我立即走。”

“嘿嘿，你想得倒好。”他冷笑着说，“钱嘛？有。告诉你，年三十有月亮时来拿吧！”

嗨！我明白了，原来他想和过去学徒时一样，要我给他白干活哩！我真气坏了，就冲着他說：“你想图赖工钱！”

他见我揭穿了他的阴谋，就涨红了脸，象疯狗似的挥动着手杖要赶来打我。

这时，工友们闻声赶来了，有的向老板说好话，有的要我忍住气去认错。我想起三年学徒，老板的千百次毒打，想起被铁水烫烂还未痊愈的伤疤，一股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坚决不干了！心想工钱你扣去吧，我不能再挨你的打了。当天，我就一卷自己的破被子，离开了这个吃人的工厂。就这样，我出师后的第一次“工资”被剥夺了。

离开海门，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想：三年前，我背着这条破被子出门，今天又要背着这条破被子回家了。两手空空的，带着一身伤疤不算，还欠下了二石谷的债……我怎么有脸去见妈妈呢？于是我决定暂且到路桥翻砂厂去找个工作，哪怕是光吃饭不拿钱，干几天，过了年再说。谁知到了路桥翻砂厂，我刚一开口，老板就回绝了。我站

在回家去的三岔路口直发呆……。

第二年正月，路桥翻砂厂却出人意外地来叫我了。这时，我心里虽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去了。到厂时，老板亲口告诉我，每月九斗米的工钱。我心想：这回总不会再骗我了，好好干吧，一点也不敢偷懒。谁知到月底结账时，账房里却按每月六斗米来结算。我忙去问老板，老板冷冷地说：“你在海门时，一月四斗米人家还不要你呢！现在一个月给你六斗米了，还不够？”

我忍住气说：“当时你不是说……”

“当时，”他脸一沉：“别噜苏了，你要不愿干就拉倒！”

听了这话，我的头象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嗡嗡直响。唉，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摆在我面前的是饥饿、寒冷、失业、负债……不干，又到哪里去呢？我能再空着双手去见母亲吗？好，为了生活，六斗米就六斗米吧。

可是这六斗米一月的工钱，什么时候发，又是个“谜”。在那个时候，要拿老板手中的钱，真象要他的命一样难。有多少个工人兄弟的父母妻儿在啼饥号寒，眼巴巴地望着这养命的血汗钱啊！可是狠心的老板却总是千方百计地尅扣、拖延……

一天晚上，真想不到账房先生却主动送钱来了。

“啊，工钱！”我这拿到手的第一次“工资”，虽然七除八扣，已只有四斗米多一点的钱了，但我还是兴奋地接过这一叠崭新的零票。我拿着这叠钞票，盘算着立即去买米，捎回家去。还猜想着妈妈拿到米后将怎样的高兴……

想着想着跑到了米行。誰知米行老板一見我手里的零票，直搖頭說：“零票不賣，快兌大票來。”等我上街跑到下街，好容易找到銀行時，柜上的人又把眼一瞪說：“統統是政府印的，什麼大票小票，不能兌。”我只得又退出銀行。這時街上的人風風雨雨地說，明天零票就要作廢了。我聽了急得一身冷汗，緊着往米行趕。一路上只見街上燈光昏暗，有些店子已陸續關門了。等我趕到米行時，米行老板說：“米已經賣光了。”怎麼辦呢？得趕緊花掉它！記得當時這筆錢能做一條褲子，去買布吧，布店里的人關着門說不賣了；那末去買雙套鞋吧，也是同樣的回答：“賣光了！”這一夜，路橋街就象被大水洗過似的，什麼也沒有了。有的只是同我一樣手里拿着零票焦急萬狀的面孔，有的只是憤怒的咒罵和淒涼的哭聲。

我拿到手的第一次“工資”，就這樣成了一堆廢紙。

中共黃岩縣路橋鎮委會徐昌友、泮朝佐整理

“陈李济”的发家

譚伙根

在广州的丸散膏丹成藥行中，解放前，陈李济藥厂号称是最老的字号。它原是一間小小的成藥店，后来老板赚了錢，扩张營業，成为設有分厂和分棧的藥厂。它的老板是怎样发家的呢？

“釣大魚”

三百多年前，開設陈李济藥舖的，是一个姓陈和一个姓李的生草藥小販。后来在双門底己未牌坊脚，合股開設陈李济藥舖，雇了几个工人，仿照单方配制蜡壳藥丸。后来，又勾通官府，高价收买皇宮秘方，大做壟断生意。这是它老板的发家一秘。

資本家是狡猾的。陈李济藥舖一开张，就要出一套手法：把藥丸的價錢降到最低，甚至低于全行业，而且，凡是来买藥的，不管用的是“銅銀”（掺有銅质的假銀币）或者是“落炉銀尾”（銀质不足的次銀币），連看也不看，一律十足照收。这样一来，馬上哄动全市，持有“銅銀”的，想

买平貨的，紛紛聞風而至，爭相購買。一時車水馬龍，拥挤不堪。于是一傳十，十傳百，都以為“陳李濟”果然“存心濟世”，沒有多久，它的招牌傳遍各地，連附近各鄉的人都來買藥了。

其實，這不過是資本家“放長綫釣大魚”的把戲而已，等他們招徠了生意，盜取了聲譽，騙得了顧客信任，把同行擠在一邊以後，便把藥丸的價格逐步提高，甚至高達全市之冠，而對拿來買藥的銀毫，也逐枚敲響驗過，諸多挑剔了。

一個月 = 一件笠衫

對於工人，資本家也有一套手法。它雇用的工人，工作時間沒有一定的規定，每天的工作以老板說話為準，說要配制多少斤藥丸，那就一兩一錢也不能少做。一般來說，每天总是由早上六時一直干到深夜一、二時。在這整整十七、八小時中，不論研藥、舂藥、調藥、煮藥……都是重活。一個姓孔的磨藥工人，就因為勞累過度吐血死了。一個姓林的煮藥工人，因為終年燒火，灶間空氣又不流通，熏得眼睛不停流淚，後來終於雙目失明了。資本家見到這些工人，有時還罵一聲“短命種”呢！

工人雖然終年累月牛馬般的干活，可是每日除了吃兩頓粗飯外，每月的工資僅是一元至一元四角。就是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也不過十元左右。以當時的物價來說，

一元只能买得十九斤糙米，或者八十斤木柴，或者十包香烟，或者一件笠衫。工人备受如此惨重的剥削，生活可想而知。工人因有病没钱医治，致成终身残废或因此丧命的，在“存心济世”的陈李济药厂的厂史上并不是个别的事。生活无着，捱到五十多岁还无法结婚的，那就更多了。

如此“铺规”

资本家不只是在经济上剥削工人，还制订出种种“铺规”，动辄以开除来威胁工人，迫使工人哼也不能哼一声地做牛做马。“铺规”中有这么一条：凡是把茶杯放在蜡丸台上的，一律开除。资本家把这开除的“理由”说成是防止蜡丸受到茶水浸蚀，其实，他是把工人喝水的权利也剥夺掉，连喝口水的時間也要给他干活。还有这么一条：凡是见到老板进来而不站立的，就是没有礼貌，也要开除；凡是参加外界活动的，就是“不务正业”，也要开除。很明显，资本家就是禁止工人参加政治活动，好让他世世代代的统治下去。当时，工人被开除的，日有所闻。有一次，四十多个工人要求不再睡在地板上，结果这四十多个工人都被逐一开除了。一个姓黎的工人，在筛药粉后忘记拍下筛眼里的药粉，马上被开除了。又有一个姓龙的工人，忙中把两颗药丸放在一个蜡壳里，连已摆了出来晚饭也不准吃，就被赶出店铺。资本家对待工人是多么的残酷啊！

錢从何处来？

可是，資本家所过的生活又是怎样呢？且不說那陈李二姓的大老板，就是他們的子孙，按照所謂“鋪規”，每人每月可以支取伙食五元；每戶每月支取月銀多至一百多元；年終支取紅利多至一千多元。如有紅白二事，还可以得到補助一百多元。陈李二姓的子孙，最多的时候整整有一千多人，偌大一笔开支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工人身上殘酷剝削来的嗎！

.....

陈李济药鋪的老板就是靠对工人殘酷剝削而起家的，它从一間小小的药鋪，到成为一間設有七、八間分厂和分棧的药厂，这里面全部都浸透着工人的血汗啊！解放前的所謂三百多年的历史，也正是資本家三百多年的罪惡史啊！

揭开“老正和”这块金字招牌

上海老正和染綢厂老工人 徐雪林

旧社会，在上海滩，很多人都晓得“老正和”染厂。可是在这块“金字招牌”上，沾染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啊！

“姜太公”如此钓鱼

“老正和”老板鲁庭建本来是何等样人物？他是浙江绍兴人，初到上海时，随身带的只有一只破包袱。经他姐夫介绍进厂当了“跑街”，学得一套剥削“门道”，后来当了“老正和”的老板。不过二十年上下，“老正和”的资本扩充到一百多万银元，他从一个光棍而变成了“百万富翁”。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庭建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一九二四年，德帝国主义在上海倾销染料，许多染店老板放弃加染业务，从事买卖染料，从中获利。鲁庭建的算盘打得更精明，他认为染坊可以“大展宏图”。于是，他凑了一笔钱，先来个虚张声势，大做广告，欺骗顾客。他在杭州萧山、临平山选了两处面向铁路的山地，用铅皮做了

几个象房子那么大的字——“上海老正和染厂”，居高临下，使人站在数里外都能看得见，特别是坐在火车上南来北往的旅客，能非常触目地看到“老正和”几个大字。这块大广告，当时曾轰动了沪杭线，招徕了不少生意。他又在温州设立加染业务收发站，在温州接些零星生意，送到上海“老正和”来加染（后来在温州开了分店），鲁庭建就这样拉住了外帮很大一批生意。

鲁庭建作广告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除了作“大广告”，还买通同乡、上海流氓头子之一王文奎，由王拉关系，与黄金荣大流氓等结为“十兄弟”。他利用流氓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的荣记大世界、黄金大戏院、共舞台、城隍庙九曲桥等地大作广告。他还经常利用报刊、电台大吹牛皮。更令人作呕的是，鲁庭建为了发财，还无耻地勾结永安公司“天韵楼”的暗娼头子“三小姐”，利用暗娼在当时四大公司作活广告。此外还请来孤儿院的“洋鼓”、“洋号队”，大吹大擂地拉生意，搞得乌烟瘴气。一当门市生意清淡时，他又利用农历七月半鬼节，搞“盂兰盆胜会”，店内店外挂满红红绿绿的纸衣，请来道士吹吹打打、哼哼唱唱，大闹三昼夜，吸引好奇的顾客。

老板鲁庭建挖空心思作广告，结果使加染生意扩大无数倍，特别扩大了门市业务。一九一四年一年门市只有二千笔生意，大作广告以后，门市一年最高峰超过二十五万笔生意，增长了一百二十多倍！

老板作广告的钱完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老正

和”每染一件东西，要比一般染店价格高三成。但他又摆了个噱头：顾客每染一样东西，奉送一只精致的纸盒，盒内装有“老正和”一张商标——“姜太公钓鱼图”——顾客上钩。“老正和”老板就是这样靠广告钓鱼的！

“預約券”的秘密

魯庭建作广告打响了“老正和”的招牌，門庭若市。于是，他采取了另一种伪善的办法——发放“預約券”，騙取顾客的錢財。

“預約券”是什么东西？顾客买了这种“預約券”到“老正和”染东西，表面看来，一张三元五角的票面可抵五元使用，其实因为利潤率极高，即使打七折还能賺很多。我們举个例子来看：当时門市染一件綢长衫要一元，但染費不到一角，这是多么大的利潤！

“預約券”发放期在每年春秋两季，一到发放期，这个老板便在申报、新聞报、电台登一个月广告，天天登报、日日广播，大肆宣揚买“預約券”的好处。市民受騙，紛紛前往“老正和”門市部购买“預約券”。粗粗統計一下，在魯庭建作老板的一段时期內，他共发放了价值达一百万銀元的“預約券”！老板因为发放“預約券”发了財，“老正和”由一家門市扩大到两家，开了“老正和西号”，又到杭州开了大华水上飞机公司，还在上海开了一井香烟厂和迎芳照相館。老板生意越做越大，厂越开越多。同时“預

約券”使用是无限期的，而加染市价是随物价增长的。例如一件毛貨长衫在一九二四年染价只七角大洋，发“預約券”几年后已涨到一元二角銀元。这样，实际上一张“預約券”已經不能抵原来价值使用，顾客去染东西还要另加鈔票。粗粗統計一下，魯庭建仅仅用“另加鈔票”的办法从“預約券”中賺的錢，就有十七万多銀元。

在“爱护劳工”的金匾下

“老正和”老板对厂里工人的剝削是十分殘酷的。那时，在“老正和”厂里挂着一块金匾——“爱护劳工”，这个老板是怎样“爱护劳工”的呢？解放前，染坊行业工人根本没有工資，只有綢庄給的一点微薄“酒錫”。开头，厂小，加工业务少，后来厂大加工业务扩大，“酒錫”也增多。这时，他又从“酒錫”上打主意，規定从每笔“酒錫”总额中，他要提出百分之六，工人、学徒在分摊“酒錫”时，老板一人又要抽取三份。这样，大部分“酒錫”落入了老板的腰包。工人拿到一点点微薄的“酒錫”，怎能养家活口？一遇到生病，那就更惨了。如当时有个工人相錦荣，生了职业性风湿脚气病，由于沒錢医，只得吃点米糠对付。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工人兄弟湊了一点錢給他去看医生时，死在黄包車上。当时染坊工人由于长年累月双脚泡在污水里，很多都生职业病，有不少生病的工人因无錢医治而死去。

“老正和”老板拚命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時間长得吓坏人，一般要做十八九个钟头，生意忙时，要做二十一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逼着工人拚死拚活为他卖命。当时工人因为熬夜，睡眠不足，在干活时出了差錯，老板不但要逼着工人賠，还要罰款、停生意。有个工人徐世春，他連干了几夜活，整天头脑昏昏沉沉，一次在称衣片时弄錯了斤两，就被老板一脚踢出了“老正和”大門。

“老正和”自发放“預約券”、門市业务扩大后，老板就縮减了利潤較少的加工业务，工人的“酒釧”也少了。老板为了騙取工人为他卖命，玩出了另一种新花样——发“底薪”！規定每月三元，一年三十六元。可是，这个“底薪”同样是只空心湯团。老板規定“底薪”不按月发，要等到年底才分，平时工人只好勒紧褲带过日子。每年四时八节，老板“开恩”准許工人支一点“底薪”，可是这个錢只是在工人口袋里过过道，等一下就要买礼物送給老板和老板的小老婆，就連老板的結拜兄弟流氓头子也要工人去“孝敬”。如敢怠慢不送，那准停你的生意。这样一送礼，还能有多少錢积存到年底呢！这还不算，有一年，老板在杭州开的大华水上飞机公司，沒有撈到多少鈔票，狠心的老板就把工人全年的“酒釧”、“底薪”全部扣下，一文不发。工人等到年关，被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了，想要求老板发一点錢过个年，可是，老板却糾集了一帮流氓打手、外国巡捕用武力弹压，并破口大罵：“工人多得如狗毛，可以撈一

把搽搽，啥人不心痛我魯某蝕本，便給我滾！”

老板剝削我們工人真是耍尽了各种花样。本来，“老正和”工場里高挂着黑底白字的禁烟牌，啥人抽烟，就要停生意。可是当魯庭建开了香烟厂后，他又大发“善心”，逼我們工人抽香烟，不会抽烟的，也非要你抽不可，說什么“‘老正和’工人不抽烟不洋派！”当时，有許多工人抽烟上了癮，向老板支取下个月的“酒鈿”吸烟，老板又規定工人只准买他自己厂里出的香烟，結果刮得我們工人囊空如洗。

“慈善家”的黑心腸

魯庭建是紹兴人，厂內工人也絕大部分是紹兴人。他为了欺騙当地群众，使他們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正和”来做学徒，就表面上装出一副大“慈善家”的样子，說要为家乡做点“善事”，硬逼我們每个工人捐款。这錢到了魯庭建手里以后，他从中抽出一小部分，用他个人的名义，一九二八年在紹兴安昌装自来水消防龙头，在錢塘江造了一座过渡碼頭。这样，“大善人”魯庭建的名字便传遍了紹兴周围百余里，騙得当地群众，都巴不得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正和”来学生意。老板又在乡下物色了几个“荐头人”，专门給“老正和”介紹学徒。这些“荐头人”在人家面前說：“老正和”是块金字招牌，去这家店学生意，将来討老婆都容易些，穿吃更不用愁；滿了师不但拿“酒

鈿”，一年还有三十六元大洋“底薪”！这样，老板就从乡下騙来了大批十三四岁的孩子，到“老正和”学生意。当时我就是被騙来学生意的一个，家里为了求“荐头人”，还借了債去送礼。

“老正和”老板是如此“慈善”，要踏进“老正和”門檻是如此不容易。可是，进了“老正和”的大門，却象跌进了人間地獄！

这个厂的学徒時間特別长，一般規定要学五年，并且是五年尾、六年头，生病的时间还要补足。老板剝削学徒的手段很狡猾。有时他看你学了几年，就把你調工种，并規定調做另一个工种又得从头学五年。如有个学徒徐言政已經学了两年多，老板就就把他調做另一工种，再要他从头学五年，不照老板規定做，就要停生意。这样，徐言政苦熬苦煎做了七年多学徒。有些学徒日夜劳累，被折磨得体弱多病、个子瘦小，就是学滿了五年也不能滿师，老板常常要給学徒加两年或三年的学徒時間。在学徒期間，每人每年只有三块钱鞋袜費。給学徒吃的是什么呢？一天三頓薄粥和霉烂的面条。早上沒有粥菜，要学徒自己买，可是我們学徒哪里有錢买粥菜呢？

說起来学徒也可分到一点“酒鈿”，但是老板訂出了各种各样的罰規，把学徒一点点“酒鈿”完全刮进他的腰包。当时老板規定学徒不准看书，如被查出来，要罰大洋一元；晚上学徒睡在染缸木盖上（当时染缸埋在地下），老板派工头来查人头，发现啥人不睡在那里，罰大洋一元。

有时学徒一个疏忽，穿了破木拖板上楼，老板說你不懂規矩，就吩咐管帳的，把你仅有的一年三块钱鞋袜钱，全部扣掉。老板还特別規定了一种“敲門規”：魯庭建晚上在妓館吃“花酒”归来，敲一記門就要学徒起来开，要是敲了第二記才去开门，那就要被打、罰。我記得在一九三〇年一天夜里，老板在外寻欢作乐，回来已是深夜一点多了。睡在店堂內的几十个学徒，已劳动了十多个小时，都呼呼地睡熟了。老板敲了三記門，还不見学徒来开门，后来由一个工人起来开了門。魯庭建怒气冲冲一脚踏进店堂，揮动鸡毛掸子，噼噼啪啪将学徒一顿乱打，把学徒打得昏头轉向。打了不算，还把几十个学徒的“酒銀”全部扣掉。

“大慈善家”魯庭建，就是这样对待学徒的！平时，他常常手执藤条，无故把学徒打个“滿堂紅”（把所有的学徒毒打一頓），打了要跪，跪过要罰。在旧社会，我們工人、学徒被資本家逼得多苦！我有一对师兄他們是亲兄弟（記得哥哥叫朱柏林）。他俩好不容易苦苦熬过了五年滿师，却想不到因长期的折磨，累坏了身体。有一天，朱柏林支撑着身体去做生活，头一昏，眼一花，跌在煮沸的肥皂水內，泡死在染缸里。不久，朱柏林的弟弟也象他哥哥那样，活活地泡死在染缸里。但是老板哪管你死活，他看学徒身上有大利可图，就专门大量雇用学徒。当学徒学滿师的时候，老板就把他們开除出厂，然后再进一批无报酬的新学徒。在魯庭建当老板二十多年中，被他无偿地剝削五年而开除的学徒就有八百多人。你看，这个老板

的心有多么狠，剝削手段是多么残酷！他的每个毛孔里都沾着工人的血啊！

染坊工人的新生

一声春雷惊天地，上海解放了。我們“老正和”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組織，一九五六年实行了公私合营，我們工人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

解放后，“老正和”在劳动条件方面，也来了个大翻身。过去老板称我們“臭染匠”，不論酷暑寒冬，我們工人成年累月赤脚泡在污水里作生活；現在，我們工人每人身上有四件宝：橡胶围腰、长統靴、长手套、冬天穿的棉大衣。有些体力劳动最笨重的工序，已經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染坊工人和其他工人弟兄一样，不但有了固定工資，而且生、老、病、死有劳保。过去，我們染坊工人，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又没有什么劳动保护，生职业性风湿脚气病、肺病死去的人很多。解放后，劳动条件大改善，职业病已基本消灭了。原来生职业病的，特别是生肺病的人，經過治疗，都已恢复了健康。工人们常激动地说：解放前，我們染匠是黄连泡在苦水中——苦中苦；解放后，我們染坊工人是白糖渗进蜂蜜里——甜上甜！

王光汇整理

从苦海中解放出来

到现在为止，山东济宁玉堂酱园，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远在一九一五年，济宁玉堂酱园的紅玫瑰、白玫瑰和金波酒就享有国际声誉，在巴拿馬国际展覽会上，获得金质和銀质奖牌。玉堂酱园的包瓜、磨茄、糟魚、醉蟹、豆腐乳、合錦菜等早就全国馳名。这些名酒、名菜，香甜可口、味美质佳。可是，你知道过去这香甜的酒菜里，充滿着我們工人的血泪嗎？

四道“鬼門关”

过去，玉堂酱园的工人都会說这么一句話：“家有隔夜粮，沒誰干玉堂，鬼門关过不去，末尾把命丧！”这話一点不假。当时，在玉堂酱园干活的人，想熬上个“正式”工人，那真比登天还难。从入厂到正式工人，設有四道关，工人都叫它是“鬼門关”。这四道“鬼門关”是：

“替班”。工人要来做工，都得先挂号排队，整天在那儿等“缺”。有正式工人請假，就去替替，頂頂缺。時間長者可能等半月十天，短者也要等三两天。沒有缺就老等着。

“滑短”。“滑短”是从“替班”里升上来的，比“替班”稍好一点。每年从阴历二月上工，干到十月下工，一年干八个月的活。十月以后，资本家愿留就留，不留，就得卷上行李卷走。若资本家留你的话，待明年二月再来上工。

“短短”。“短短”比“滑短”又强一点，每年从阴历二月干到十月，结账后留在厂子里打零杂。

“长短”。“长短”又比“短短”强。到了“长短”这一关，就是已经熬成“正式”工人啦，一年到头在厂里干活。只要过年时不砸锅，第二年还可以继续干。

那时候要几年才能熬成个正式工人呢？说两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的。

有个工人叫孔繁仁，为人忠厚老实，长的熊腰虎背，干起活来真是一个抵俩。当时，“替班”、“滑短”、“短短”都赚一样多的工钱，每月二十斤小麦钱。“长短”，每月多拿八斤麦子钱。资本家为了在孔繁仁身上榨出更多油水，让他拿着“滑短”的钱，干着“长短”的活。就这样，一直干了二十四年，没熬成个“正式”工人。由于赚的几个钱仅够吸烟，一辈子没说上个老婆。到他老了卧床不起时，资本家就把他撵出厂门。他背着一领草苫子和一块破麻袋片，回到了故乡，不久就死去了。

老工人李广台，十五岁进玉堂酱园。当他干了五年“替班”快挨到升“滑短”时，资本家裁减“替班”把他减去了。没有办法，他只好等着，等到资本家又招“替班”时，他重新去挂号，重新当“替班”，从头再熬起。他又熬了十年，

好不容易熬过了“滑短”到了“短短”，资本家又来了个“长短”不收，再不提拔正式工人了。李广台只好再熬，一直熬了三十五个年头，才成为“长短”。李广台在玉堂酱园，总共干了四十七年。在这四十七年里，他节衣缩食，省吃少用，也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活。他借人家的地皮搭了一间小房，妻子终年拉着五个孩子要饭。玉堂酱园是一年发四次工资，一次发三个月。在李广台病重被辞掉的时候，他领了三个月的工资。李广台病死之后，资本家说他沒有干足三个月，硬追回了一个月的工资。

騙人的“紅利”

资本家剝削工人的手段，既毒辣又阴险。当时玉堂酱园有个規矩：从总經理到工人，除了拿工錢以外，年終一律参加分紅利。资本家常常用这样的話籠絡工人：“好好干吧，到年底亏不了你。”实际上又怎么样呢？分到工人手里的紅利究竟有多少呢？

一九二九年全年，玉堂本来盈利八万四千吊。可是资本家为了少让工人分紅利，留着肥自己，就造“两本帳”。把盈利的三万一千五百吊从帳面上扣除，作为资本家的机动花銷，这叫“加提余利”。剩下这五万二千五百吊再分紅。怎么分法呢？把这五万二千五百吊分成八份，孙家六个股东各拿一份，厂里再除去一份公積金，共扣去七份，然后把剩下的这一份，从总經理到工人分成八等进行分紅。

總經理為特等，拿這一份的 20%，即一千三百一十二吊；經理為一等，每人拿三百吊；總會計和副經理為二等，各拿二百吊。分到工人頭上時，每人只剩下兩三吊錢。紅利分完以後，資本家獍笑着對工人說：“伙計們，今年的買賣不強，紅利不多。大家努力吧，下年生意好了再多分。”

按照這一年八萬四千吊的紅利計算，被資本家用各種名目弄去了八萬吊，占 95.2%，我們工人只得四千吊，占 4.8%。總經理陳守和，用他這年賺得的錢，捐了個“六品藍翎”（和濟寧州的州官一樣大），出入坐四抬轎。資本家孫家五個股東，這一年在曲阜城各蓋了二百多間房子，是曲阜縣有名的“五大門”。

不管工人死活

玉堂醬園的資本家還在“有例不可免”、“無例不能興”的招牌下，大肆欺壓剝削工人。

現在，看看這“無例”是什麼？看看我們老工人在這“無例不能興”的幌子下受的辛酸遭遇吧！

玉堂醬園做豆腐乳用的豆腐，全靠自己磨。磨豆腐本來可以用牲口，可資本家偏偏不用，他們說：“牲口吃的多，還得人侍候，死了還得賠一大筆錢。”因此，資本家拿工人當牲畜用。五個工人抱着一盤磨，一夜得磨八盤豆腐，共三百四十斤大豆。工人毛福來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一夜推到亮，汗出得象個水雞似的，推着推着暈倒了。

第二天，他去找資本家講理說：“我們當伙計的干活，也不能豁上死！”資本家說：“好哇，初生的牛犢不怕虎，你还敢教訓我，你知道，你的‘小鍋’就在我的腳背上，一踢就完！”當時，毛福來就被開除了。罵工人，砸工人的“鍋”，這還都是平常事，苦的還算李黑妮的死。

一天夜里，雷電交加，大雨如注，資本家攆着工人起來蓋醬缸。黑妮蓋完醬缸回來後，被雨凍得面色蒼白，渾身打顫，一頭倒在破席上，再也沒爬起來。工人們看黑妮病得厲害，去要求資本家給黑妮看看病。資本家說：“無例不可興，有例不能免，玉堂的老規矩不能破，不能開這個頭。”黑妮的病愈來愈重了，工人們又去找資本家，資本家說：“弄几棵夏菇草熬點水喝就好了。”喝下後，待了半天，黑妮就死了。

污辱人 逼死人

清朝末期，玉堂醬園的資本家——孫家門上出了不少“官”，從此以後，玉堂醬園的資本家，在政治上壓迫工人，在經濟上剝削工人，在社會上欺壓人民就更厲害了。

玉堂醬園的資本家，在買賣“發財”之後，開始在鄉下大批買地，租給佃戶。為了催租要禮方便，在佃戶集中的地方，還修了不少花園、別墅。到了夏季，資本家孫明峰就住在夏營別墅里。他住夏營別墅時，佃戶家娶媳婦得先給他報信。人家的媳婦來後，他得先接三夜。誰要不

依，輕者退佃，重者送衙門。有一次，佃戶夏連玉的老婆，被孫明峰強拖了家去。第二天夏連玉到衙門去告，哪知道孫明峰早派爪牙到衙門里給縣太爺送了信。夏連玉喊冤上了大堂后，剛說了兩句，縣太爺就把惊堂木一拍：“唉！你这刁民，勿需分說，老爺我已派人走訪，分明是你妻子不正，夜里偷跑進孫老爺家里作盜，你还反說什麼！”然后他大叫一聲：“來人，重打四十大板，推下堂去！”夏連玉含冤回到家里，一看妻子已懸梁自盡了。这个庄上，被孫明峰污辱和逼死的婦女，真是無法計數。

資本家孫篤丞，為了擺闊氣，光皮袄就有九十六身。早起穿的皮袄面上的花是“含苞待放”，中午又換上一身“花儿盛開”，到下午再換上一身“花敗叶落”。更使人氣憤和少見的是，世上有吃山珍海味，燕窩魚翅的，哪有吃“油炸冰胡”的？可是資本家孫敬儒，就想出这个鬼名堂。他叫廚師鄭照祥，把冰块沾上雞蛋，然后放到油鍋里炸，既要外面包的雞蛋熟，又要里面的冰块不化。為了这个，廚師不知受了多少污辱和打罵。

解放后的玉堂醬園

| | |
|----------|----------|
| 玉堂历史虽悠久， | 殘牆断壁屋露天， |
| 破烂攤子无法收。 | 碎磚烂瓦堆成丘。 |
| 路窄好比羊腸道， | 犹鼠野狸伴人后， |
| 二人不能对面走。 | 蒿草长的没人头。 |

解放前夕，玉堂醬園這種荒涼破爛景象，老工人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時，玉堂醬園已經是外強中干，奄奄一息了。而現在，玉堂醬園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新氣象。一九五四年公私合營後，拆除破屋斷牆一千三百多間（條）。在這廢墟上，新建和改建廠房一萬一千平方米。廠內修了六條馬路，長達五百多米。並且有了自來水、電磨、果露酒機械設備等。生產機械化程度提高了45%。減輕了工人的體力勞動。

解放前夕，玉堂只剩下一百零八名工人，產品品種也只有十五種了。大家最熟悉的紅玫瑰、白玫瑰和金波酒，包瓜、磨茄、糟魚、醉蟹、豆腐乳和合錦菜等也都停產了。解放後，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公私合營以後，醬園生產才一天天發展起來。現在，玉堂醬園的工人，已增加到四百餘人，產品種類增加到六十多種。不但恢復了過去停產了的名牌產品，而且又增加了葡萄酒新品種。產品行銷全國二十多個省市，並遠銷國外。

解放後，工人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現在廠里有醫療室、理髮室、浴池、托兒所、俱樂部和職工業餘學校。工人們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也翻了身，再也不用為生活发愁了。他們一個個精神煥發，干劲沖天，不斷提高生產，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忘我地勞動着。

中共山東濟寧市委宣傳部記錄整理

資本家的“科学管理”

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新職部主任 徐會奇

解放前，有些小商店的职工，总以为旧社会在大公司工作，受剝削較輕。其实，天下烏鴉一般黑，哪有不剝削、不压迫店員的資本家。这些大公司的資本家，剝削手段更阴險，更毒辣。我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先后在上海先施公司、中国国貨公司做了二十年店員，亲身經受过他們的殘酷剝削和压迫。

報名也要受剝削

我老家在浙江农村，十三岁那年，听说上海先施公司招考练习生，我就到上海去投考。

報名的条件很特別，第一，本市沒有家。这样可以免去家室牵累，一心一意为資本家卖命；第二，本市要有亲戚家。这样，在你发生意外事情时，資本家可以找你的亲戚，并且可以不給宿舍。第三，身体健康。所謂身体健康，就是要长得“买相”好，脸上沒有伤疤……

这次到先施公司报名的有几千人，报名后，指定到先施公司光学部，照三张象片，收费六角（当时市场上照同样大小的象片，只要二角）。并规定要在指定医生处检查身体，每人付挂号费一元（当时一般医院挂号费是二角或三角）。几千人报名，结果只录取二十多名。这样，资本家就捞了一大笔。

过了“报名关”，就是“保单关”。先施公司的资本家规定，进公司工作，必须要有设在租界里的店铺担保。找这样的铺保，不花钱送礼是难以找到的。同时，公司人事部门还要去实地对保，如果不给人事部门“烧香”送礼，他们还会百般刁难，使你仍旧进不了公司工作。

卖身契式的志愿书

练习生进公司工作，首先要填志愿书。志愿书上第一条，就是要遵守规章制度。先施公司有四十三条规章制度。资本家把剥削和压迫店员的各个方面，都订进“规章制度”，并在租界的“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统治的机构）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社会局”备案，使剥削和压迫店员合法化。这些规章制度因为条文太多，我无法全记清，记得头几条是：不准集会，不准谈论国家大事；不准罢工怠工，违者开除，情节严重者送捕房究办；不准看书看报，……总之，都是一些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练习生同意遵守这四十三条，就得在志愿书上盖手印。名

义上是志願书,其实和卖身契也差不多。

遵守制度也被开除

除了明文規定的四十三條外,还有很多沒有明文的規定,如卖日本貨时,要說是美国貨;卖用外国字做商标的国貨时,要說是外国貨。又如女职工生小孩要开除,职工进店不能走正門,怕我們偷东西,要从旁門出入,便于公司派人監視,等等。

这些明文和不明文的規定,即使我們都严格遵守了,可也不一定保住飯碗。我在先施公司当了三年零三个月的练习生,从未請过假,也沒有违反过制度,也被开除了。原来我从一九二九年考入先施公司后,除了上班時間,給資本家当牛当馬的干以外,在下班以后,或节日、假日还要到商品部长(也是公司股东老板)家里去干杂活。有一次,我因事沒去,他藉口我穿紅袜子,有政治問題,把我告到經理那里。經理就說我要造反,违反了規章制度第一条規定,让两个巡警把我推了出来。穿紅袜子有政治問題,当然是資本家的胡說,沒有給商品部长家里干杂活,也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三年练习生期滿,要轉为正式店員,要增加工資了。資本家在店員身上多花一个錢,也是肉疼的。他要另招进一批廉价劳动力,所以想尽办法把我挤掉。

簽 到 鐘

一九三三年，我又考入了中國國貨公司。這裏的規章制度比先施公司還多七條，共五十條。限制得使人更喘不過氣來，剝削手段更毒辣。

這裏是用簽到鐘來計算職工出勤的，辦法是職工每天上下班，都要把自己的卡片扔到簽到鐘裏，鐘就自動地在你的卡片上，打上你進出公司的時間。資本家鼓吹，這是科學管理，其實是更殘酷的剝削。

一次，上海下大雨，街上的積水深到膝蓋，上午公司沒有營業，出了張布告說，下午二時開始營業。按規定，店員在公司開始營業前半個小時到，就不算遲到。當天下午，一千多職工，有幾百人都是在一點半前後到的，結果這些人都算曠工一天。原來簽到鐘不會靈活計算，你上午沒來，它就在你的卡片上打上遲到半天。平時遲到半天，算曠工一天。而曠工一天，按規定要扣兩天工資，於是，資本家借着“科學管理”，又在職工身上搜刮了一筆。

八包米和三包米

解放前，資本家叫我們店員是“櫃台獅子”，先施公司的經理常說：“一個人要當上十年八年店員，就只能把他當成廢物了，公司如不隨時處理，就成了廢品攤、難民收

容所了。”中国国货公司的經理，也常威胁店員說：“上海滩要找一百只狗不容易，要找一百个人当店員，容易得很。”資本家按照他的这种邏輯，随便可以解雇店員，使我們时刻提心吊胆，怕打碎飯碗。国货公司一个食品部的營業員，因为在进貨时尝了一条小魚，被董事看見，就被开除了；公司一个董事的太太来买东西时，看見两个營業員互相說了句話，这两个營業員第二天都被开除了。因类似原因被开除的店員很多。

另外，資本家与資本家之間，还相互勾結，压迫职工，使我們走投无路。国货公司有个姓王的出納員，被資本家无理解雇后，又投考冠生園食品公司。不料被資本家从照片上认出他在国货公司工作过，因而不予录取，使他长期失业。

为了怕被开除，我們职工真是时时刻刻揪着心。特别是每年年底，公司都要大量开除店員，这时大家更是坐臥不安。平时，职工食堂每天要做八包米的飯，到了每年十二月中下旬，每天只做三包米的飯，还吃不完，因为职工們怕在年底被开除，連飯也吃不下去了。

如此診療所

那时候，先施、永安和国货公司，都設有診療所，可这些診療所，不是为职工医病而設的。它只起两个作用，一个是藉口为职工医病，搞投机倒把，倒卖西药，为資本家

謀利；一个是监督职工。当医生发现职工有慢性病时，就强迫职工請假回家休养。职工前脚走，公司紧接着就是一封辞退信。那时候，职工得了慢性病，等于宣布死刑。这样的診所，不知逼死了多少职工的性命。我的两个弟弟，就是被这样的診所逼死的。我二弟徐曾望，曾在国貨公司作了十几年的营业员，得了肺病就被辞退，結果因为无錢医病，生活无着，不到三个月就死了。我三弟徐曾耀，过去是永安公司的营业员，得了腸結核症，被解雇回家，也是不到三个月就死了。后来我也得了肺病，因为亲眼看到两个弟弟的惨死，为了生活，我根本不敢去診所检查，也不敢說自己有肺病，直頂到上海解放。解放后，在組織的关怀下，治好了病。要不是解放，我肯定早就不在人間了。

李学庆学徒的时候

刘北犯

他又小，又瘦，又干，穿身粗土布衣裤，提了个细细的小行李卷。他轻轻推开门，带好门，轻轻把小行李卷放在脚边，就直楞楞地站在聚隆布庄的柜房里了。

他名叫李学庆，刚满十三周岁。

他站在那里，个子刚刚比端坐在他面前硬木太师椅上、肥胖的大掌柜的高一点点；腰围，还不及胖掌柜的三分之一。他刚站定，胖掌柜的浓眉就倏地皱起，两道油黑贼亮的眼光，就象要看透他的骨头似地，盯牢在他身上了。他浑身一冷，慌得腿也抖了：

“这老东西难道也嫌我长的黑？……”

胖掌柜的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肿眼泡，后脑勺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些短头发，下巴上有一片疤痕，眼光一时也没离开李学庆。

李学庆低下头，连胖掌柜的眼光也不敢接触了，只是两手紧紧地捏着自己的衣服襟儿。那身衣服，穿过一冬，又旧又小，显得那么不合身。

他到北平一年多了。头一年，一九四一年初春，他步

行一百五十里，离开饒阳县王崗村老家到保定，轉搭火車到北平來時，就盼望能跨進一家商店的門檻當學徒了。那幾年，饒陽境內年年鬧水災，一下雨，滹沱河就泛濫。村里地勢低，大水一進村，幾個月也退不走，逼得家家戶戶只能在積水的院子里支起棚子睡。大水過後，村里村外淤泥有房檐深，任什麼庄稼都留不下，不少人家就只能吃糠，吃黑心菜，吃老高筋，吃污水潭里打撈出來的水萍花；燒的，也只能燒些大水沖來的亂草、碎木頭和葦根。饒陽城里，有敵偽軍；村子里，有偽村長，有地主，除了這些傢伙，窮苦人家都不能不要着吃。那年臨過年，李學慶也不能不跟隨鄰家兩個經常要着吃的孩子出去要了。過了年，母親囑咐他：“你走吧，別在家受罪啦！到北平找你爹學徒去吧。……”正好有個遠親要去保定，便把他帶出來了。他還以為一到北平，他那在鼎盛南貨食品店做糕點工人的父親，就能給他找個鋪子安身。沒想到托人求友，接連拜見了幾個掌櫃的，都說他：“黑！難看！”“個小，扛不動東西！”“字寫得難看。”一個也不肯收留。一年閑過去了，終於長高了些，字也練好了些，這才經人介紹，邁進這家開設在崇文門外專營批發業務的布莊的門檻。這一次，胖掌櫃的還嫌他個小，嫌他臉黑嗎？胖掌櫃的那逼人的眼光，不是也分明嫌他嗎？……

終於，胖掌櫃的盯夠了，開口了：“在我這兒學徒，不准留髮！不准刷牙漱口！不准光腳！不准穿褲衩！穿小褂要蓋上屁股蛋兒！要起在別人前頭，睡在別人後頭！不

准看书看报！三年里头，不准回家！没事不许到‘鼎盛’去看你爸！不许随便出门！柜里的事不许往外讲！口袋里不准带零钱，有零钱，就送你走！……记住了吧？呵？我说的是铺规，犯下哪一条，我都开革你！让你卷铺盖！我这没闲饭养活闲人，懂吧？我有钱买得鬼推磨，并不指望你，懂吧？”

胖掌柜的说一句，李学庆答一句，说罢，胖掌柜的慢悠悠地一边往起站，一边吩咐下来：“去吧，火房里住，先攉火烧水，烧好水淘米做饭，回头到我家抱孩子！……”

一天夜里，几个掌柜的和两个大伙计都睡下了，李学庆还站着没有睡。他不想睡，他想家。有一年多没见到母亲、弟弟和妹妹了，他们也想他么？快五月了，快下雨了，村南漳沱河还象往年一样发水么？弟弟也要了饭么？要来了，母亲还一口也舍不得吃么？弟弟眼看快满十二周岁了，母亲也会要弟弟出来学徒么？也会象他临来时一样，连着两夜都睡不着，嘱咐又嘱咐么？

“去吧！熬三年！人家给什么气，忍下来！人家支使什么，干什么，天大的难处，也要挺下来！……”

他想着母亲嘱咐的这些话，想着母亲的声音。这一晚，他怎么也不想睡了。银柜上有本《三侠五义》，是三掌柜的弟弟拿到店里来的。他拿起书，刚趴到银柜上看了两页，胖掌柜的醒了。

“你干什么来的？”胖掌柜的眼一瞪，忽地从里屋走出来。李学庆连忙放下书，没敢出声。“你是来学徒的，不

是来点灯熬油的！”胖掌柜的吼，“你学点好！别学这个！学点真格的！……”李学庆还是不出声，胖掌柜的火反倒更大了，眉也立了，眼也圆了，吼到后来，吼累了，想抽烟：“去！给我装袋烟，抽着！”李学庆撬开炉子，抽了半天抽着了，两手攥着跑回来递过去时，胖掌柜的一巴掌打来，差一点把烟袋打到地上：“废物！连烟袋都不会拿！拿烟锅对着我，安心烫死我？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骨头？……”足足骂了一袋烟功夫，骂够了，累了，胖掌柜的吆喝他关上灯，一头钻回里屋又睡了。

李学庆摸黑站着，更不想睡了，只想哭。他心酸眼也酸。可是，想起母亲的话，他咬紧嘴唇，挺过去了。

十五岁

十五周岁时，李学庆个子高些了，却依然长得单单薄薄，又黑又瘦。两只大眼，嵌在狭长的颧骨微突的脸盘上，怎么看都显得大了些。然而，两年下来，这孩子肩膀练硬了，一次扛十来匹布，一百多斤，不再哼哼唧唧、哆哆嗦嗦、走几步歇一歇了。从布庄到一些常有来往的布店去的路，他也摸熟了。几个掌柜的看中了这一点，免了他做饭、烧水、抱孩子一类杂活，专要他送货、取款了。

整整熬了两年，熬到这一步，总算沾到了一点做买卖的边，李学庆的老父亲忍不住为儿子高兴了：“孩子，咬紧牙，再熬它一年，就出头露面了……”然而，这日子，哪怕

多过一天，他都觉得难熬了。他罵：“几个掌柜的沒一个好东西，大掌柜的欺我，二掌柜的欺我，三掌柜的也沒少欺我！……”

三掌柜的是专管送貨、发貨、加工和店里杂事的。大眼，馬脸，大高个，却长了个躬躬腰，若不，那腰直起来，人就高得連进布庄的門框都得哈腰了。

一天早上，躬躬腰要李学庆送四十匹色布到兴隆街永昌布店去。买卖是躬躬腰自己应下的，花色是躬躬腰搭配的，包是躬躬腰亲自封的。他叮嚀李学庆：“你只管送到，拿錢回来，別的都說不知道。”正是夏天，燥热，李学庆騎車，跟在拉布的人力車后，就奔兴隆街去了。一个小时后，他大汗淋漓地又跟着人力車把布拉回来了。坐在屋里的躬躬腰一見，白脸猛地变紅，騰地竄出布庄来：“怎么拉回来啦？”“人家不要！說色不对，背滯色多……”“你就不会說，跑街經手的你不知道，先攔那儿！”“我說了，說了半天也不中……”“你硬攔那儿！”“人家說，随我攔哪儿，就不让攔人家屋里。人家說尺碼不足……”“告他！”胖掌柜的也走出屋来嚷。尺碼不足是真的，正是他指使二掌柜的和三掌柜的剪下的，小辮子給人家抓住了，他反倒觉得抓住人家的小辮子：“哪匹布不是四十碼一匹呵？問問天津織布的，是不是四十碼一匹？他再胡說，我告他！……”“人家說咱交的那是上海貨，原本一匹四十二碼！……”这又是真的，把上海出的布剪成和天津出的布一般长，他一匹布就賺下两碼！布头上的商标，也是他仿

照上海色布的商标伪造的。“底”叫这家小布店给揭了，胖掌柜的气得说不出话，躬躬腰眼也气圆了，骂：“你心眼就那么死？也不来个电话，商量商量，就自己作主拉回来？到手的买卖都叫你做跑啦！废物！光会吃！……”“我说我是学徒，只管送……”躬躬腰一挥手，不耐烦了：“拉回来你还有理！我说一句，你顶一句！”李学庆说：“我没瞎说，我怎么还有理？……”躬躬腰脸一沉，火了：“你还委屈！你还有理！你卷铺盖吧！你走吧！”二掌柜的这时也帮上腔，走出屋来跟着叫：“该走！”说着，三个掌柜的一转身，都回屋去了……

李学庆委屈了几几天不想说话，出去送货时，偷着去找老父亲，这才把一肚子不快说了。老父亲眼湿了，问：“怎么又留下你了？……”“眼房先生替我说了好话，我赔了不是，才没让我卷行李……”老父亲慢慢掏出腰包，蹒蹒跚跚走出去，给孩子买回一块蛋糕，说：“吃！……”李学庆就着气吃了，说：“早晚我要揍他们！”老父亲也压低了嗓门骂：“这些鬼王八羔子！黑心肠！孩子当牛当马，两年才挣上一件大褂，只为这点事就要孩子卷铺盖？……”

进 货

心肠不黑，几个掌柜的口袋就满不起来，做过几年批发生意之后，他们就不满足了，想捞更大的了。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们改称布店，在花市大街西

口的繁华地段上开起零售門市部来。呢絨綢緞、粗細布匹一概經營，却又独独着力經營窄面土布。果然給他們走对了这盘棋，不上一年，买卖做大了。

土布都是四掌柜的黑大个从东曉市小百貨批發市場收来的。这天十点，他从东曉市回来时，他在市上选中的布已經由五个卖布的送到店里，只等他驗收了。四个小商販先由他打发走了，最后剩下的是一位出售数量較大的从香河来的农民，这农民四十来岁，穿件白粗布袄，黑粗布褲，一进屋应酬几句，就央求黑大个：“掌柜的，过数吧，我等着回村哩！”

这农民的布，黑大个在东曉市上就看中了，幅面寬，足有一尺二寸，細密，厚实，加工染色之后，能得对半利。这号布，他們起名叫“金錢大尺布”，一向是延庆、怀柔一带山区农民爱用的。早几年，日本人盘踞北平，山区人来买的少；日本投降，来买的农民才又多了。黑大个心里有这个譜，并不露声色，接过布来，数了数匹数，大尺匆匆一量，不說短尺，就叫管庫的徒弟李永泽搬到后庫去了。到了点完款，这农民才发现明是十三匹，却只給了十二匹的錢。农民央求黑大个再查对查对，黑大个却暴跳起来：“我們这大买卖，还昧你一匹布？”农民不依，黑大个也死咬住十二匹不放，連嚷带推，黑大个硬把农民推出了柜房。“你打人！”农民嚷。“你訛人！再嚷，还要告你訛人哩！”黑大个也嚷。“我告你！我去找警察！”农民嚷着冲上大街。黑大个双手叉腰，冲着农民背影罵：“去找皇上

也不怕你！警察胳膊肘也不向着你！……”

李学庆听不出为什么吵，装作解小手，悄悄溜到后边去問李永泽。

“那布，我刚刚过了数，是十三匹，訛了人家一匹！”李永泽憤憤地告訴了李学庆。

李学庆解完手回来，学徒刘禎、刘安杰又到后边打水来了，李永泽又憤憤地告訴了他們……只一会功夫，門市部里十几个学徒都知道了。

半小时后，这个农民大吵大嚷着回来了：“警察跟你們一个鼻孔出气！”

“你嚷吧！等会儿叫警察来抓你！”胖掌柜的拦在門口不許农民进来。“再嚷，我还揍你！”黑大个也拦在門口，一边喊，一边捋起了袖子。

农民进不了屋，坐在門外哭起来：“我沒法活啦！回不去啦！我在你們这上吊！……”

門市部里，顾客、伙計和学徒，一时都鴉雀无声了，量布的拿着尺子，量不下去了。买布的也沒心思买了。二掌柜的晃晃秃头，鷹鼻子一翹，吼道：“看着他！真上吊，扭他找警察去！”

一直到这天夜里上門，学徒、伙計們誰也沒再說笑，晚飯是一个个蹲在伙房里一声不响地吃的。只有几个掌柜的，因为占了便宜，說笑得更欢了，吆吆喝喝地也更凶了。刚上完門，李永泽還沒吃完飯，就被二掌柜的从伙房里喊出来：“去！把今天进的布都搬出来！”李永泽扛出了

布，照例象往日一样，全体动手“加工”，五十二尺算一匹，名义却是“五丈四大尺布”；不足五十二尺的，一段段用浆糊粘上，有时，一匹多到三四个接头。预备去染的，浆糊粘不住，用线缝上。忙过十一点，忙完了，掌柜的們要睡了，二掌柜的照例吆喝：“注意啦！这些事誰讲出去誰卷铺盖！别人若知道这么办，就把咱們頂啦！……”

这晚上，尽管几个掌柜的外表上沒事人似的，还跟往日一样先就睡下了，其实并没睡好。一夜間，秃头和黑大个爬起来好几次，到铺子外面去轉悠。平时，每晚都有人值班打更。这天，他們又多派了一个学徒整夜守在門市部外，就怕那个香河农民当真吊死在外面。

这晚上，李永泽睡的更晚了。当天收进的布量好了，当天从染房加工回来的土布还得趁着有潮气，由他和另一个学徒一起打“頂包”，每十匹一包，捆紧，再一包包堆起来。这样，十多天过后，打开包再卖时，布就显得又硬又厚，能卖上大价錢了。

活是累的，繁重的，也象每晚一样，李学庆、刘禎这些小徒弟一个个悄悄溜进庫房，帮忙来了。起先，几个年轻人只是低头干活，誰也不出声。到夜深人靜了，掌柜的們一点动静也沒有了，几个人才憤憤地、悄悄地咒罵起来。

“真他媽缺德！明明十三匹布，硬給人家十二匹的錢，訛人家！”李永泽罵黑大个。

“沒个好！掌柜的都是坑、矇、拐、騙、偷……”刘禎

也罵。

“这叫什么世道，連警察都跟掌柜的一个鼻子眼儿出气……”李学庆也罵。

学 徒 之 間

胖掌柜的盼生儿，盼了多年了。他老婆連生了九个，都是女的。胖掌柜的放出口风，再生儿，他要討小老婆了。不料第十胎上，竟然生了儿。他老婆一步登天，李学庆和刘禎可就变成“李媽”和“刘媽”了，不是在鋪子里伺候胖掌柜的自己，就是被派到胖掌柜的家里，伺候他老婆，烧飯、洗衣、抱孩子。冬天，两个人的棉袄又是尿味，又是尿味，都是胖掌柜的那宝贝儿子給糟蹋的。

不只是有了儿，买卖也越做越旺了：人員，增到五十多。布，老本不过一千来匹，現在，光是摆在門市部里的就有三千多匹。門市部原来只有两間寬，两間深，現在扩充到五間深，除了临街的一面，另外三面都摆滿了貨架子。原来的門臉是老式的，現在改建成水泥的、新式的了。柜房里的摆设，也和刚开业时大不相同了，靠墙摆张新买的紫檀大条案，上面摆只黑漆嵌銅花的大座钟，两旁是两个蓝花細瓷大纒瓶。靠北墙，摆着两张紫檀太师椅和一只茶几，賬桌旁边是只紅漆的大銀柜。靠东墙，有只黃銅架子的大铁床，是专为胖掌柜的預备的。柜房前面的二层小楼，上层原来給学徒睡觉，这时也象下层一样，騰出来

做了庫房，裝布了。

平常，胖掌柜的不在家睡，睡在柜房里的大铁床上。天才矇矓亮，他就起来了，先到貨場里大声咳几声。他一咳，伙計、学徒就你推我，我推你，“起哇！”就都起来了。忙到深夜，他看看馬路上沒多少人啦，才吆喝一声：“上門吧！”学徒們又得先給他提夜壺、鋪被褥去。

沒有不困的。有时候，困得实在沒办法了，李学庆偷着溜进后面伙房，用凉水洗把脸，刺激刺激，再回来站柜台，等吆喝。起先，还蒙过了胖掌柜的，常了，胖掌柜的就盯上他了：“你老往后跑！就你机灵？往后給我好好呆着！……”

胖掌柜的自己不困么？他当然也困。每天，过了十点，他就打哈欠了。过了十一点，吃点东西，他就躺倒在大铁床上，开始睡午觉了，一睡多半天。誰要到他屋里，得悄悄的；誰要走过他的窗外，也得悄悄的。誰若是不小心惊醒他，就要挨罵了。然而，在学徒之間，在伙計們之間，在靜悄悄中却漸漸挨近了。

常常，哪个学徒送貨次数多了，搬布、扛布時間久了，另一个学徒就会悄悄出主意：“歇会儿再干，喝点水……”常常，正当大伙說着笑着，忽然有人拍拍下巴，大伙就知道下巴上有疤的胖掌柜的来了；如果拍拍头頂，就知道秃头二掌柜的来了，大伙就不說也不笑了。

这年春天，刘禎小腿上长了連疮，烂了。一进夏，晚上蚊子多，一咬，一抓，烂的面越发大了。刘禎起先不敢

說，买了膏药貼着。貼了几貼，反倒流黃水了，刘禎用張油紙裹上，外面再裹上布，穿上袜子。病得这样，他还是不敢跟掌柜的說，不敢請假治，大伙也一直替他瞞着。疮終于鬧得更大了，腿也肿了，連袜子都脫不下了，晚上睡覺得把脚垫起睡。疼得实在忍不住了，他偷偷同李学庆商量：“我就說了吧，請假治治。”李学庆說：“別說，說了就要辭退你了，咱再想想法子……”法子还没有想出来，有一天，刘禎在柜房里給几个掌柜的沏茶倒水，胖掌柜的忽然鼻头一聳，皺起濃眉来：“你身上怎么这么臭？”“我沒刷牙，嘴臭！……”刘禎支吾。二掌柜的秃头聞了聞，也搖頭：“不对！你腿上臭！”刘禎只好說了实話。刘禎倒完水，剛出柜房，秃头就給他的介紹人打了个電話：“赶紧把你那学买卖的弄回去吧，都臭啦！別让他回来啦！……”秃头外号“人販子”，数他开革的学徒多。有一年，他就开革了十四个。他說了話，刘禎只好走了。一个月后，腿还没有完全治好，介紹人又赶到布店說合，刘禎这才又回到布店来。刘禎腿好了沒有多久，李永泽又累吐了血，当真被辭退了。

李永泽生得单薄瘦小，十七岁了，还没长结实。人老老实实，不能說，不能道，才被安排到庫房里干重活。干了一年，就累出了肺病。治好了还不到一年，病又犯了，一咳起来，大口大口地吐血，一夜之間能吐半痰盂。起先，大伙也帮他瞞着，誰有空，誰就到庫房里帮他干一会儿，誰听到有什么偏方，就給找来。有人听說刺菜湯治吐

血，便偷偷到野地采了些刺菜来，偷偷在伙房里熬了湯給他吃。李永泽的病却不見好，血吐得更多了，一咳，就得有人摟着，扶着，终于被胖掌柜的和秃头看到了。胖掌柜的把刘禎找了去，說：“这么吧，他这病在这养不行，这不安静，也沒地方养，你送他回乡下吧！給他一匹布……”一匹布，当时值二十来元，去了路費，就沒多少剩余了。大伙一听，先沒敢告訴李永泽，悄悄去找胖掌柜的央求：“人家病了，要治病，要吃、要喝，就是在家养病，一匹布怎么够？能花几天？……”胖掌柜的眨眨眼皮，問刘禎：“你說給多少？”刘禎不肯說，“我能怎么說！我說給十匹布，能算数？”胖掌柜的說：“給两匹吧！”大伙还是不走，好話說了三千六，嘴唇都快磨破了，胖掌柜的这才勉强答应給三匹布，另給回去的路費……

第 四 年

学到第四年，李学庆还没有单独接待过一个顾客，有机会站柜台，也只是給大伙計做下手。大伙計剪好布，他給包上；大伙計折乱的布，他給叠好。他早就盼着自己也能接待一个顾客了。这天，顾客特別多，伙計們忙不过来，他胆子一壮，跟走过自己面前的一位老太太搭上了話。老太太要买黑大絨，他拿出一匹，老太太嫌不好。他拿出第二匹，老太太还說不好，問他还有沒有，他說：“沒有了！”老太太轉身走了。李学庆一抬头，正見秃头側着

身子，紧皱眉头，用“瞅边眼”瞅着他。他才把絨放好，秃头已經到了他面前了。

“飯桶！得受一輩子窮，当不了掌柜的！到手的买卖都做不成！”秃头把李学庆扯进柜房恶狠狠地数道，“你是本屋大徒弟了，学了这么多年啦，这都干不了？你不会再拿一匹一样的，拿刷子刷一刷，順順絨，一尺多要她两毛、五毛，充好的？你不会，你就沒見別人怎么卖？……”

李学庆不出声，秃头的火气可一分分添上了：“再来顾客，不許你卖！干别的！拾掇拾掇貨！”秃头走开了，隔一会又走回来，吩咐李学庆：“去，去，你仔細学学四掌柜的那一手！”

李学庆走进門市，正見黑大个領着三个老乡在左边柜台前的茶几旁坐下来，都是山里人打扮，穿的光板羊皮袄，白毡帽头，带釘子棉鞋。带头的是位年紀較大、矮个、脸膛紅潤的小老头。

“都从延庆来？……”黑大个带笑招呼。小老头点头，另外两个也点了点头。“我說面熟么！不是在延庆見過，就在老义和見過……早先我是老义和的伙計，都知道老义和吧？……”老义和是家老布店，专做土布生意，一向跟农民打交道，后来歇业了。恰好，小老头早几年到过北平，在老义和买过布。听黑大个这样一說，立时感到亲近一层，就又点了点头。“呵，老交情啦，咱这店里人哪，都是老义和的，鬧日本那几年，我們淨搞批发啦，咱沒見面。日本投降啦，才开起这并鋪子。”黑大个順着杆子往

上爬，一边吩咐身旁的徒弟：“沏茶！拿烟！……”小老头吸着了烟，黑大个这才说到正题上：“买什么，你老只管说话，没错，只能拿好的，不能拿错的，价钱还不能贵啦！……”小老头放心了：“行咧！都是熟人，那还不好办，还有啥说的，就听你一句话呗！你拿啥，我要啥呗！还能不信服你？……”说着，几个人同时打开腰包，掏出购布单子，算了算，只差一点就是三十匹。当中，小量的是花布，黑大个要伙计们给配；大量的是“五丈四大尺布”、“金钱大尺布”，黑大个自己从库房里给搬出来，一边解包，一边假惺惺卖交情：“咱这还是老义和存的东西哪！日本投降前的货！不是老字号，哪有这货呵！你老就听我的，白布就全买这个，幅面宽，厚实，你老就别多花时间又挑又看啦！……”其实，哪一匹都是早几天才从东晓市上收罗进来的。哪一匹都有两三个接头，黑大个只要瞟一眼每匹布头上的暗号，有几个小洞洞，就知道有几个接头了。价呢，黑大个也随机应变，每匹多要了七、八毛钱。从来都老老实实的小老头，信以为真，快快活活地应下来：“行咧，听你的！”三个人中的一个却不大放心，偷偷摸了一摸，低下头看了看。黑大个做贼心虚，一见，立时眼一瞪，嚷嚷着倒打了一耙子：“你看，没说让你看嘛，你还信不着！我还能错待你？买卖不成仁义在，我们也要拉几个老主顾嘛……”只几句话，就把个老实的农民说红了脸，连忙把手缩回去了。

几个农民走了，李学庆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默默

叮嚀自己：“这是坑人騙人，弄虚做假，不能学！”

翻 身

国民党反动統治搖搖欲墜，市場上出現了漲風。物價，上午一個價，中午一個價，下午又一個價，一天幾變了。胖掌櫃的來不及改價錢，隔一會在價牌上貼張大紙條：“每尺一律加一毛！”“每尺一律加二毛五！”學徒們的收入却不是一再加碼，還都沒有工資，仍只在每年舊曆年底任憑掌櫃的們“賞”點錢花，却又不能馬上支出來，得存在賬上，買雙鞋、買塊毛巾，得掌櫃的同意才能支錢買，幾個月過去，便不值錢了。

每天一早，黑大個還是到東曉市去，三掌櫃的躬躬腰還是守庫房，胖掌櫃的和禿頭還是守櫃台，也還是買進賣出。可是，漸漸的，在學徒們不知不覺間，庫房空了，貨架上的布一天天松了。等到臨近北平解放，竟是遲開門，早關門，只銷不進了。總會計每天也不守在賬桌上了，頭一天賣下的錢，第二天一早就由他一古腦兒帶到金店里換成金條，帶回來暗暗交給幾個掌櫃的私分了。到了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後，布店里已經空空蕩蕩，只剩下四百來匹布了。

“解放啦！翻身啦！大家日子好過啦！”白天，晚上，胖掌櫃的假裝高興，在貨場里，在學徒面前，這麼嚷嚷。可是，暗地里，十多個拿工薪的外來伙計，從這年下半年起，

一个个都被他悄悄解雇了。在这些伙計面前，他訴苦、裝窮、抱怨：“咱这买卖不好，賠啦！干不下去啦！你另外找个高事吧，分給你七匹布……”

事实是，如果积极經營，买卖还是能做好的，几个掌柜的不，单单明碼售貨一件事，他們就办不到。“咱們不听这一套，”胖掌柜的气呼呼叫，“上級說他的，听不听，在咱們！做买卖哪有不討价还价的！”他果然沒有听，还是不肯积极經營，一九五〇年春节一过，几个掌柜的就张罗歇业了，首先通知了李学庆：“給你点路費，七匹布，你回家种地去吧！以后时局好轉，咱們还开张，你在家听信……”要李学庆第一个走，原来是掌柜的們施的一計。李学庆走后头一天，胖掌柜的就跟剩下的徒弟們挑明了：“咱这买卖不能不关了，你們大师兄都走啦，你們还不走？……”

三十来个徒弟，各分了七匹布，也都散了。

原来这又是一計：几个月后，一九五〇年十月，那些在掌柜的們眼里认为听话、或能干的十三名徒弟又被召了回来，聚隆布店又在原址复业了，大多数徒弟和伙計却都借着这次歇业被解雇了。过去布店开支中沒有房租，这一次复业，掌柜的們說要付房租了，理由是：“我們下了老本，出了錢，买了房子。”他們把房租訂为每月一千七百斤小米，結果，他們每个月仅从盈余里就分走这么多斤小米的錢。另外，說他們自己也要拿工資了，数目是他們自己訂的，每个月二十碼布。掌柜的才掙这么多，学徒們的工

資当然不能超过，一律訂成每月十八碼布，合十元零八角。小徒弟还要少，只給了十五碼。歇业时，伙計、学徒們分剩下的两百多匹布，他們自己并没有分，这时全說成是他們新购进的了，他們又下了本！

不仅經營上还是老一套，处处弄虛作假，欺騙政府，欺騙顧客。同时，掌柜的們，以为学徒还得象以前一样，任他們剝削，任他們驅使。到了晚上，几个掌柜的照例喊人鋪被，沒人应；清早，喊人打洗臉水，仍旧沒人应。对于他們的不法行为，二掌柜的还是照例吆喝：“不准讲出去，誰說了誰卷鋪盖。”但是再沒有人听他这一套了。晚上上了板，学徒們一个个都溜走不見了。

时代变了，学徒們有党支持，有店員工会撑腰，他們敢于挺直腰板和資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了。不久，李学庆加入了店員工会，跟着，十二个学徒全加入了。

